

第 11 卷第 4 期 2018 年 12 月

Vol. 11, No. 4, December, 2018

国际高等教育

#MeToo 运动和性别问题

活动中的议程：拉美高等教育中的女性问题.....	127
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性骚扰问题.....	129
作为全球学习时刻的#MeToo 运动.....	131
性别与高等教育：职场骚扰和薪资差距的曝光率增加.....	133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中的性暴力.....	136

国际化和国际问题

英国脱欧与大学：重新配置欧洲高等教育部门？.....	138
印度与中国：亚洲的两大高等教育中心.....	140
日本的“超短期”留学：戏剧性的增长.....	142
衔接学院：加拿大新的院校形式.....	144
包容性国际化：增加入学机会和公平.....	147

大众化与质量

实现大众化的价值.....	149
菲律宾优质高等教育的普及.....	151

文章发表与期刊

科学出版社的“香槟塔”.....	153
高等教育期刊：一个新兴领域.....	155

反思私立高等教育

消失的公立高等教育垄断.....	157
重新思考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	159

非洲视角

学生流动与就业能力：埃塞俄比亚经验.....	161
加纳的质量保证：收获与挑战.....	163

国家与地区

中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学术漂移.....	165
俄罗斯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自治与问责制.....	167
越南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性战略.....	169

活动中的议程：拉美高等教育中的女性问题

Alma Maldonado-Maldonado、Felicitas Acosta

Alma Maldonado-Maldonado: 墨西哥教育研究部—国立理工学院研究和高级研究中心 (The Departamento de Investigaciones Educativas [DIE]-CINVESTAV) 研究员

电子邮箱: almaldo2@gmail.com

Felicitas Acosta: 阿根廷萨米恩托国立大学 (the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General Sarmiento) 研究员、教授

电子邮箱: acostafelicitas@gmail.com

2015 年, 在巴西举办的名为“主厨”的真人秀节目中, 一名 12 岁的女性参与者收到了来自男性观众的骚扰信息。因此, 一个女性权益组织决定在推特上发起一项运动, 谴责对女孩的性骚扰, 她们使用标签是: #primeiroasido (我的第一次被骚扰经历)。巴西女性对此做出了回应, 并开始分享被性骚扰的经历, 其中大多数是她们年轻时发生的。2016 年, 一位生活在墨西哥城的哥伦比亚女权主义者开始了类似的运动。她提倡使用另一个标签: #MiPrimerAcoso (我的第一次被骚扰经历) 以谴责墨西哥妇女遭受的暴力。在随后的日子里, 超过 10 万名妇女参与了这一分享性骚扰早期回忆的倡议。同样, 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人称, 她们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骚扰, 7 至 9 岁的小女孩也受到骚扰。在拉丁美洲,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似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事实上, 在该地区的女性凶杀案数量为全球之最。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 所谓“男子气概”(machismo) 的文化似乎是男女关系的内在特征。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妇女遭受身心暴力、歧视、缺乏平等机会, 且社会对其工作和能力认可有限。40 年来, 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等拉丁美洲国家中只出现过十

位女总统。并且, 妇女在立法机关、政府、工业、科学、商业和社会中最有名望的职位上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MeToo 和 #Time's up 行动 (2017 年) 涉及了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问题, 并揭示了针对女性的男权案件, 特别是那些处境较为脆弱的女性。本文反映了该地区大学在这方面的情况。

高等教育中的女性

在拉丁美洲, 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明显: 2013 年, 在高等教育总入学人数中, 约有 1 315 万名女性, 而男性为 1 044 万。受教育机会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但其他问题则需要引起注意, 例如女性能够进入哪类高等教育机构和课程, 因青年时期怀孕而导致的女性辍学率, 以及劳动力市场和薪金方面的差异等。

目前关于性别和骚扰的辩论有三个主要关注领域: 男性与女性在学术界和行政管理方面最有名望和收入最高职位之间的差距; 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 女性教师成为更高职位的男性滥用权力的受害者。

在墨西哥, 即使在最乐观的时期, 只有大约 16% 的大学校长是女性; 因此, 这一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高级领导层中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 但总的来说, 这反映了

女性在大学中获得最高职位的难度。玻璃天花板似乎牢不可破。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中也是如此, 女性在这些领域的入学率不到总招生人数的 10%。2009 年, 只有 19% 的女性位于最重要的教师同行评审体系中的顶级水平。

由于关于 #MeToo 和 #Times up 行动 (运动以及 #MiPrimerAcoso 运动的公开辩论, 墨西哥学生活动家变得更积极主动地谴责被指控骚扰女学生的男教师。墨西哥最大和最负盛名的大学都遭到指控, 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 (the Center for Economics Research and Teaching)、自治都市大学 (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伊比利亚美洲大学 (Ibero-American University) 等。由于缺乏相关协议, 通过社交网络和校园示威的公共指控是学生用来强调性骚扰的主要手段。在对学生滥用权力 (如性骚扰) 的情况下, 必须采用正式机制来处理涉及这些问题的学校教师。目前, 许多大学正在研究这一主题。有关骚扰或针对女教师的案例被越来越少地曝光, 原因各不相同, 包括: 学术界的权力结构, 谴责男性同伴或管理者所带来的对个人职业的影响, 以及女性可能感到更为弱势的事实。如果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推广类似于 #MyFirstHarrasment 的运动, 不难想象许多女性会效仿。

阿根廷的公立大学与墨西哥大学拥有共同之处。大约 48% 的大学学者是女性, 但并没有相应比例的人数获得领导职务。尽管女性院长的人数近年来有所增加, 但女校长的数量却非常少, 在所有的 57 所国立公立大学中, 只有 5 名女性校长。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全国科学和技术研究理事会上, 其中 54% 的

年轻科研人员是女性, 但只有 25% 的人能进入科研事业的顶端。

近年来在性别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所国立大学开创了将女性产假延长至六个月和男性陪护假延长至一个月 (女性产假通常为三个月, 男性为三天) 的先河。过去 20 年来建立的国立大学通过了性别政策和行动议定书, 以预防性别暴力、性暴力或歧视。2015 年, 最著名的国立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通过了这项议定书的决议, 这一举动非常及时, 因为学生在同一时期控诉一名教员的性骚扰行为。自那时起, 这一决议主要是学生使用社交媒体等谴责性骚扰的支持材料。此外, 历史上一一直活跃于示威活动的学生组织在 3 月 8 日的国际妇女节游行中表现出色。到目前为止, 她们似乎在制定解决该国妇女受歧视问题的议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断前行

显然, 拉丁美洲关于对妇女受到暴力和歧视的情况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并要求制定议定书以及继续讨论如何增加学术界、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平等机会。就高等教育机构而言, 需要公共关注某些案例 (主要是在社交网络和大众媒体的帮助下) 的积极分子与不能再忽视受害者的政治当局之间可能会趋于一致。这可能表明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改变其政策以防止性骚扰的发生, 并制定政策以解决各层级中男性与女性的差距。学生和教师都更了解自己的权利和限制。这对该地区来说是件好事, 但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

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性骚扰问题

Christine Dranzoa

乌干达 Muni 大学 (Muni University) 副校长、乌干达非洲女教育家论坛 (the Forum for African Women Educationalists) 主席

电子邮箱: cdranzoa@yahoo.com

在非洲,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是许多年轻人及其家庭的愿望,是提升其自身社会经济背景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毕业典礼得到隆重庆祝——这些仪式也预示着未来重要的长期利益。高等教育机构是非洲进步的动力引擎。性别平等和多样性问题在二十一世纪得到了发展,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这些原则才能实现均衡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非洲大多数政府已经通过并批准了诸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和自由宣言》(the *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1948 年)《非洲联盟性别政策》(the *U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2009 年)等政策,这些政策要求各级政府遵守和实践性别平等并赋予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女性权力。

非洲高等教育中女性的脆弱性

在埃及,99%的女性遭受性骚扰。在南非,四分之三的女性遭受某种形式的虐待或性暴力。2014 年和 2015 年,南非警方每年记录 53 000 起强奸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许多妇女报告了亲密伴侣的性暴力行为。在乌干达,性骚扰和对妇女的性别暴力,包括绑架和谋杀,每周都成为头条新闻。在全球范围内,35%的女性遭受各种身体或性暴力。女性遭受贬损性言论和未经本人允许的性侵犯。

在非洲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学生有不同

的背景:有些是刚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有些是较大年龄的入学者。超过 90% 的年轻学生来自经济贫困家庭。与高等教育机构不同,中学和大多数家庭在性别关系方面具有限制性和严格监管。传统上,女孩和男孩的社交方式不同,但这对这些不受监管之外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年轻女学生是脆弱的、无知的,不经世事的、天真的、她们渴望探索新发现的自由,这有时会导致其意外怀孕并使她们完全辍学。对女性、女孩,有时甚至是男孩的猖獗的性行为操纵发生在高等教育机构内外。非洲大多数大学都制定了针对性骚扰的性别政策,但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大学宿舍是女性和男性弱势学生居住的地方,宿舍往往廉价且不受管制,这是骚扰发生的首选地,因为这里吸引性掠夺者。其他原因包括经济需求,取得好成绩以进入稀缺的劳动力市场的迫切性、毕业生失业、同伴压力等。监测系统是常有的,但其作用由于非专业管理而受到削弱。一种强烈的父权制传统,往往因纯粹的厌恶女性行为而得以加剧,从系统上损害了女性员工和学生,导致了对其进步的否认并破坏其学术生涯。一些性别暴力行为的肇事者是对学生负有责任和带有影响的人,如教师、课程协调员和考试官员。最后,外国文化的影响,加上药物滥用,促成了一种不利于男女之间相互尊重的

文化。

性别平权与平等的战略性进步

实现两性平等和无暴力社会的战略进步应包括使男子和男童对性别问题敏感并赋予其权力。专业的辅导员、心理学家、教导主任和宿管人员应以有组织和有条理的方式与学生、高级管理层和院系一起工作，就触发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因素提供咨询、宣传和公开讨论。协调学术和课外活动，如自然俱乐部、体育和游戏，以提供反馈机会，让年轻人保持忙碌和健康。关于社会问题的学生咨询，大学中负责任的住宿生活，对艾滋病和肝炎等疾病的预防，加上严格的院校文化

和性别政策，这些是建立包容、尊重和多元化学术社区的实用方法。始终如一地沟通、建议和提高学生的敏感度至关重要。扭转邪恶的文化需要大胆的院校领导，果断地处理性行为不端的案件并严格挑选专业人员。

结语

高等教育中的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是体制失败的迹象。受害者看到其学术生涯发育不良或被摧毁。贫穷和道德颓废的恶性循环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的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性骚扰行为破坏了非洲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为全球学习时刻的#MeToo 运动

Joanna Regulska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教授、副教务长和副校长

电子邮箱: jregulska@ucdavis.edu

世界上大多数女性都经历过性骚扰、殴打和暴力, 或者有时被推入她们认为感觉不对的区域。她们经历了“相同”的时刻, 然而这对于她们每个人来说, 却是个不同的时刻。对某些人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时刻; 对另一些人来说, 情绪和身体上的疼痛可能已经无法忍受, 持续数天、数月或数年。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个时刻必须被深深掩埋。由于其文化和政治环境, 无法谈论它; 这种经历是可识别的, 但却无法言说的。表达和承认这一经历可能受到女性的年龄、性取向、跨性别、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宗教、更广泛的文化习俗以及现在和过去的许多其他成长经验的影响。

本文将#MeToo 运动置于全球学习的背景之下。鉴于性骚扰、攻击和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全球性质, 同时鉴于此类女性的经历被普遍忽视, 作为国际教育工作者, 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一特定时刻置于更广泛的努力中, 以便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全球和国际理解? 我们如何以促进跨文化和跨文化意识的方式利用这一全球运动?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探索充满情感、恐惧和痛苦的生活体验空间, 同时又融入各种可能产生误解的文化实践中?

此时此刻的复杂性

这是一个充满力量而又非常复杂的时刻。它之所以有力, 是因为它与世界各地的

女性产生共鸣, 因此提供了在世界不同地区与代表不同文化体验和观点的人们进行对话的机会: 这是国内外全球学习的机会。当我前往不同的国家时, 我也会听到拒绝、否定和公开的批评。#MeToo 不会与每个人产生共鸣; 对许多人来说, 它是一种特权, 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或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女性是无法享有的。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因为女性正在定义骚扰、暴力和攻击对其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些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或在更大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 但这也是一个复杂的时刻, 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它是由当地的文化背景、政治气候、强大的制度、阶级、种族和民族特权、同性恋以及许多其他压力形成的, 由权力和统治阶层行使。

性别的权力等级

许多研究论文、文章、法律简报、会议和研讨会都试图定义性骚扰、攻击或暴力侵害女性的行为。女性已经发表了言论、书写了文章、提供了证明并在适当的场合作证, 但是, 许多定义和现行法律框架大部分仍由男性撰写并由男性决定。男性主导的宗教管理对大部分文化习俗进行立法和控制。大多数立法和执行机构都由男性主导。法律专业主要由男性管理。重男轻女的标准形成了规范。

多样性的隐形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寻求发声和行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承认多样性。女性在肤色、种族、性取向、跨性别、年龄、文化信仰和/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有很多不同。此外，这些因素相交的身份标记使一些女性比其他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所有这些变化要求她们所有的声音都被听到、承认并得到回应。

多样性仍然是#MeToo 的弱点，也是国际教育的弱点。很多时候，我们在移民、国际学生、第一代学生、转学生等群体中发言——我们虽然这样做，但没有反思这些群体特征告诉我们这些学生的身份、经历和生活内涵。很多时候，这些大规模群体的吸引力使我们缺乏对骚扰或强暴在不同文化和国家背景下具有不同含义的细微差别的理解：对某些人而言的犯罪行为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是日常事件。

很多时候，我们只关注学生，而教职员工似乎被抛在了一边。我们需要认识到，许多男性，因为他们的肤色、性取向、其过渡状态或/和他们的阶级，确实进行过暴力行。作为国际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与校园内的其他人合作，营造一种氛围——让包容性对每个人都充满意义。

国际教育者作为全球对话的推动者

虽然在今天，女性根据自己的经历定义骚扰、暴力和/或攻击，但我们国际教育工作者需要了解这一时刻对我们的院校以及我们的国际化战略和方法意味着什么。为了更加普遍和全面，国际化不仅需要关注我们应该建立的政策和计划，还需要创造有利于跨文化学习的空间、全球知情的对话以及承认不同经历和多样性的空间。

我们从女性（包括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将这声音转化为充满力量的学习和教学时刻？我们如何促进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成的文化认可，以便我们能够面对并从这一刻开始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那些有不同观点或信仰的人？国际办事处和国际高级官员是否愿意大声疾呼并拥抱这一时刻？我们如何做到自我反思并认识到国际教育管理者将代表不同的观点？这些都不是新的问题，但许多人仍在等待答案。#MeToo 运动始于 2006 年，但仅在 2017 年才被重视和承认。

挑战仍然存在

今天，许多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个人能动性及其身份的复杂性；这些不是身份微不足道的维度。在我们重新思考国际化战略时，我们需要通过我们周围的多样性和差异来赋予权力。作为国际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许多工具可供我们实现目的：学习和出国留学；与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的联合教学机会；短期的、基于主题的研讨会；与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合作研究和实习；生活与学习社区；让整个校园参与对话的年度主题；员工交流；学生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等。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不同的术语、短语、行动、政策、策略和日常实践意味着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广泛和更有根据的对话机会和经验；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拥有的所有工具。

制定新战略需要我们的集体意识、理解并致力于倾听、学习和参与跨文化学习，以及通过跨部门对话和行动带来的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作为国际教育工作者，无论有多少假设、信仰和实践，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归属感。

性别与高等教育：职场骚扰和薪资差距的曝光率增加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荣誉教授、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组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HEPRU)

主任、BH 协会教育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一项强奸审判掀动了爱尔兰岛，该审判于 2018 年初进行，涉及一名当时 19 岁的年轻女子，以及两名著名爱尔兰橄榄球运动员。与爱尔兰共和国的此类审判不同，北爱尔兰的强奸案属于英国法律管辖范围。因此，人们不仅知道被告的身份，而且每天都会报告明确的犯罪细节。这名女子的身份应该被隐藏起来，但她很快被识别出来，社交媒体也开始过度报道。九个星期后，这两个嫌疑人和他们的朋友都被无罪释放。正如评论员所说，这是一个法庭，在合理怀疑之外需要证明有罪，这不是道德或低俗行为的法庭。

这是一个 #MeToo 时刻。人们举行集会，#IBelieveHer (我相信她) 的口号排名第一，都柏林性侵危机中心声称电话增加。公众的愤怒程度与通常公众对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的容忍程度发生冲突。

校园中的性骚扰

大学校园的性骚扰往往受到较少的关注，尽管媒体偶尔会报道有必要解决员工对学生和学生对学生的骚扰“流行病”。《卫报》(The Guardian) (2017 年 3 月 6 日) 在 2017 年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学生在 2011 年至 2017 年期间至少对大学工作人员提出了 169 起性侵犯指控；至少有 127 名教职员工对其同事进行指控。

根据“University UK”组织的研究，在

有积极的大学领导的情况下，解决学生对学生的骚扰问题最为有效，但在处理仇恨犯罪、仇恨骚扰和员工对学生的不端性行为方面进展较少。虽然总体结果与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 (the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的研究相符，但后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学院内部的权力关系上，尤其是员工对学生的不端性行为。

包括性骚扰在内的欺凌和骚扰也是爱尔兰校园的问题。大学有校园规范和准则，但一般认为学生是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可以让大学摆脱困境。这些行为准则涉及的对象也包括工作人员，内容包括性骚扰、身体暴力、欺凌、欺骗或学术剽窃，以及在室内吸烟。在极端情况下，学生可以被驱逐出境。2017 年，《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 (2017 年 11 月 6 日) 报道了一些涉及学生的案件，其中大多数涉及对男性的投诉。

这些问题引发了关于性教育更广泛的公众对话，特别是围绕“同意”(consent) 的概念。在爱尔兰，教育部长宣布对小学和中学的关系和性教育 (relationship and sexuality education) 进行重大审查。爱尔兰和英国的大学正在为新生推出“同意”培训。爱尔兰国立戈尔韦大学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的“智能同意”(Smart Consent) 培训研讨会旨在“帮助您探索‘同意’定义的不同方面”。

在专业水平上,我对涉及研究生和主管之间权力关系的案例较为熟悉。这种行为影响男性和女性学生;它经常被正常化并且难以监控。还有一种情况是,话语文化降临到我所谓“口头强奸”的话语中。在一对一的音乐或声乐教学的情况下,如在音乐学院,或在学生指导的过程中,教室的门上必须装有窗户,或是门需保持打开的状态,作为对所有相关人员的保护。院校合作或设施共享实践,是为了丰富学习环境或提高效率,但是由于合作学校双方可能采取不同的行为准则,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人们极不愿意将一些案件公开讨论,因为可能会使某人的诚信、行为受到质疑或使其未来职业前景受到威胁,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尽管个别案件一直存在,但大学性骚扰问题在欧洲受到的关注要少于美国。最终,缺少相关科研项目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意味着这类行为的规模到底如何仍然未知,大学也缺乏基本的指导方针。对学术卓越的狭隘定义也会影响组织文化和学术行为。

与性别有关的薪资差距

升职和薪酬是另一回事。作为过去 20 年来在爱尔兰担任大学副校长职位的少数女性之一,我可以证明变革的步伐十分缓慢。事实上,随着女性在典型的学术职业道路上取得进步,与男性相比,她们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些数据是无可争辩的。

欧盟出版了《SHE 数据》(SHE Figures),监测整个欧盟的科研和创新中的性别维度。2002 年,大学毕业生在男女两性中的比例相似,但女性毕业生的比例几乎增长了两倍。2016 年,欧盟的性别差距,即 30~34 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比男性高 9.5%,几乎所有成员国的女性人数都超过男性。

然而,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 16%。只有 20%的欧洲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是女性。2013 年,女性占顶级科研人员的 21%,自 2010 年以来进展非常有限。在科学和行政委员会领导者中,女性只占 22%,在董事会成员中占 28%。最大的变化是在教授层面,大多数欧盟国家的院校没有女性全职教授。

最近的性别工资差距在 2018 年公布的数据中成为英国的头条新闻。这是指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之间的差异,这是相对于男性的收入而言。虽然表明的都是我们知道的事,即男性占据了获得最高薪酬的职位,但是这一结果令人惊讶。全国薪酬差距中位数为 9.8%,大学为 18.4%。两所大学的女性教职员薪酬比男性低 37.7%。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著名的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中,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男女薪酬差距最大,为 29.3%。

在爱尔兰,高等教育管理局(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发布了《爱尔兰高等教育机构性别平等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 of Gender Equality in Irish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2016 年),提出了广泛的建议。自 426 年前第一所大学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女校长,且目前在科技类学院中只有两位女校长。这些数字在学科方面尤其明显,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医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and Medical, 简称 STEMM)方面存在最大差异。随着 2009 年平等法庭以性别歧视为由向爱尔兰国立戈尔韦大学的一名女性颁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奖项,教授聘用问题在爱尔兰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对声。

然而,爱尔兰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说明政策和资金补助可以推动行为变化。《雅典娜科学女性学术网络宪章》(The Athena

SWAN Charter) 于 2005 年在英国成立, 旨在鼓励和承认在 STEMM 学科中推动女性职业发展的承诺。它已经扩展到所有学科, 并在爱尔兰得以采用。它有三个奖项等级, 铜牌是“入门级”, 表明院校对 10 项关键原则的承诺, 并要求具备关键的自我分析和行动计划。最重要的是, 三个爱尔兰科研资助委员会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 2019 年达到铜牌级别, 到 2023 年达到银牌级别, 才有资格获得科研经费。

因此,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积极参与聘

任副校长一事, 以平等、多元化和包容性为目标, 且也忙碌于对高级教职员的聘任事务上。爱尔兰正在引入培训以解决无意识的偏见, 且规定高级管理层所必需参与培训。但培训的进展非常缓慢。爱尔兰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建议中性别平衡目标的 40%。因此, 在爱尔兰有关于配额问题的讨论。我所了解的信息就是, 没有什么比金钱能更快地敦促院校进行改变。虽然任命女性只是为了满足新规定, 这让我感到沮丧; 但我们已经几十年来没有和男性一起有过同样经历了。

埃塞俄比亚高等教育中的性暴力

Ayenachew A. Woldegiyorgis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博士研究生、研究生助理

电子邮箱: woldegiy@bc.edu

非洲的高等教育处于性暴力的控制之下。例如, 非洲大陆的顶尖高等教育之一乌干达的马克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揭露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结果, 震惊了整个学校, 也因此成为国际头条新闻。仔细研究埃塞俄比亚的情况有助于了解问题的本质和程度。

院校案例

汉娜·特非拉 (Hanna Tefera) 自 2013 年 11 月起担任阿达玛科技大学 (Adam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大学性别事务理事会 (the University Gender Affairs Directorate) 主任。2018 年 1 月 18 日, 由于未知原因, 她收到了一封解雇信。特非拉说她的离职是突然的,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与此同时, 艾迪斯·斯坦达德 (Addis Standard) 称特非拉的撤职与她正在调查的案件有关。去年 12 月, 她给大学校长写了一封信, 声称一名女学生遭到了性侵犯, 并要求立即对此事进行调查。这封信称这名学生遭到一名闯入她宿舍的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袭击。特非拉参照宪法的相关规定和大学的规定, 谴责了这一罪行。她强调, 如果有必要进行宿舍搜查, 那么派遣女兵是合适的做法。(在过去几年的政治不稳定局势之后, 军队已在大学中部署, 以控制潜在的抗议和破坏。) 在她的信中, 特非拉进一步表达了她对其办公室报

告的多起性骚扰案件的关注, 并要求大学采取严格措施。

据报道, 特非拉是在大学董事会成员直接下令后被解雇的, 该成员也是国防军的高级官员。这一案例象征着大学的整体情况和领导层的漠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如何成为女学生安全的学习环境? 学生服务专业人员可以做些什么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问题的重要性

由于埃塞俄比亚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 社会受到性别偏见、不平等和性暴力的困扰。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例如, 沃拉塔索多大学 (Wolaita Sodo University) 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称, 在该研究中, 462 名女学生中有 36.1% 的人表示自从她们进入大学以来就遭受过性暴力, 而有 45.4% 的人在过去的生活中遭受过性暴力。马达瓦拉布大学 (Madawalabu University) 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在其样本中的 411 名女学生中, 41.1% 的人在她们生活中经历过性暴力, 25.4% 的人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经历过性暴力。为了探究探究女学生辍学的原因, 吉马大学 (Jimma University) 的一项研究发现, 82.4% 的受访者 (占 108 名辍学学生的比例) 表示这与性骚扰有关; 57.4% 的人表示怀孕是辍学的原因之一。其他大学的研究也报告了类似的、普遍的性暴力。据报道, 性暴力是由同学、

教师和大学雇员以及与大学无关的其他人实施的。有些学生带着以前的性暴力经历来到大学，加上咨询和支持服务不足，这使她们很难克服创伤并在大学环境中感到舒适。

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认为，对女学生的可用支持非常有限。虽然文化规范和禁忌禁止学生出面寻求帮助，但在实际情况下，支持服务往往准备不足且缺乏人手。学习环境的心理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充分重视。

更大的问题：性别偏见

在过去十年中，在缩小女生入学率（从 2005 年的 24.4% 的女性本科学生人数到 2015 年的 32%）和教师组成（从 2005 年的女性教师人数 10.3% 到 2015 年的 12%）的性别差距上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女性仍然经历很高程度的差别待遇。尽管在刚进入学校时获得照顾，但性别偏见和性暴力继续损害女学生的经历并阻碍她们取得成功。女学生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甚至有报道称，院校大力阻止女学生选择硬科学领域，以此作为降低女学生辍学率的策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被视为一种“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措施。

与此同时，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担任讲师级别职位的可能性降低 50%，获得助理教授级别以上的可能性降低 72%。这种惊人的差异可以通过一系列因素来解释，这些因素阻碍了女性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尽管整体统计有所改善。

可采取措施

虽然自上而下的行为改变方法可以说是缓慢而且效率较低，但基于同伴的方法似乎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大学社区的态度变化对于防止性暴力发

生至关重要，并使受害者有信心发表意见并寻求帮助。数十年的社会/心理研究表明，当他们清楚地了解暴力和参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所需的技能而不损害他们自身的安全时，旁观者更有可能进行干预。有些案例表明，赋予学生和学生领袖作为旁观者是打击校园性暴力的有效方法。

这需要参与大学范围内的持续宣传计划。在这样做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几点。首先，该计划应该覆盖整个大学社区。与那些被认为意识不强的人或那些自然被这个问题所吸引的人交往是不够的。其次，考虑到性别偏见和性暴力的某些方面根深蒂固于社会规范，重要的是首先澄清性暴力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第三，计划应包括不同的参与机制和激励措施，以增加参与性和可持续性。

认识到资源限制和有限的合格人员，可能的补救措施是发展并启用培训师的志愿者培训，使用标准化的教材和质量控制，通过金字塔计划，在一定时期内到达大学的每个部分。一旦实现这一目标，为所有新学生和员工提供强制性培训可能是确保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措施。

这种基于同伴的方法不能替代其他策略，也不能单独使用。它必须被作为与基础广泛的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和系统层面中领导的明确承诺是成功的关键力量。在高级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中促进妇女的安全和支持性工作环境，以及通过合格的工作人员和充足的资源加强学生服务，是院校和政府必须采取的措施。然而，缺乏学校高层的承诺，不应该成为学生服务和性别事务办公室在当前的限制范围内做出努力改变的阻力。

英国脱欧与大学：重新配置欧洲高等教育部门？

Aline Courtois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助理

电子邮箱: a.courtois@ucl.ac.uk

在 2016 年的公投中，51.9% 的注册选民赞成英国离开欧盟。“脱欧”流程于 2017 年 5 月正式开始，其实用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未知。英国脱欧可能对英国及其他地区的高等教育产生严重影响。

目前，英国是仅次于德国的欧盟第二大竞争性科研基金获得者。英国科研人员更有可能被选为合作筹资竞标的领导者，而英国则是科研奖学金获得者的最佳目的地。英国大学中有 6% 的学生和 17% 的员工来自其他欧盟国家。虽然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声望在这一成功中发挥了作用，但英国也因其作为欧洲“门户”的地位而受益，因此也吸引了学生和科研人员。

此外，英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近一半是与至少一个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撰写的。在英国学术界合作最多的前 20 个国家中，有 13 个在欧盟。这些共同撰写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欧盟资助的科研合作。最后，几个关键的泛欧研究设施，如高功率激光能源研究设施，总部设在英国。根据欧盟成员资格规则保证的自由流动对于这些研究设施充分发挥其潜力至关重要。

“英国硬性脱欧”可能对英国高等教育部门造成毁灭性打击。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不会是唯一一个受到“硬脱欧”影响的领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欧盟学生到英国学习将被收取全额的国际学生

学费，科研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英国将无法再参与合作竞标。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的“英国脱欧和欧洲科研”项目

在此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着手调查英国脱欧对整个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潜在影响。我们聚集了来自丹麦、德国、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士以及英国的 10 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在这些国家进行了 127 次访谈，其中包括国家层面的关键人物以及大学领导者、学者和年轻的国际流动科研人员。鼓励科研参与者思考英国脱欧对其机构及其各自国家体系的影响。

风险与机遇之间：不平衡的影响

该研究揭示了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态度。引人注目的是，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参与者（以及葡萄牙的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首先不是英国的重要合作者，因此英国脱欧的影响对其相对有限。

在我们的研究中较大的国家，如德国，实际上可能会从可能的资金重新分配中受益。丹麦和荷兰等北欧国家会更加矛盾。一方面，鉴于它们在资金获取和科研生产力方面的表现，以及它们倾向于提供英语课程的

实际情况，它们完全有能力从英国脱欧中受益。然而，其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英式”导向。就此而言，人们认为英国的离开将加剧美国政治变革对与重要伙伴的未来合作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荷兰和丹麦的参与者也明确表示，他们依赖英国作为欧盟层面讨论的政治盟友，在欧盟，赞成竞争性科研资金的国家与倾向于低竞争和平等主义系统的国家间存在紧张关系。爱尔兰可能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它准备在国际学生流动方面受益，但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体系。英国的国际学生和外籍人士的命运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来自波兰和葡萄牙的人而言。

总的来说，有人认为英国在吸引力和声誉方面会有很多损失。英国参与者特别担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失去资金的风险，且怀疑英国政府是否会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缩减这些部门的资金。我们的瑞士受访者——签署了临时科研合同的工作人员，也表达了非永久性学者将是最大受害者的担忧。

高等教育与科研格局的重构

虽然合作是现行制度的一项关键原则，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伙伴。“伊拉斯谟计划”被设计为互惠学生交换计划。然而，一些国家接收的学生比他们送出的学生多得多：特别是爱尔兰和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少数家庭的学生享受了这种欧洲流动机会。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申请的成功率因国家而异，留学目的地喜好网络明显可辨——通常集中在德国和英国等较大的国家，而西班牙、法国和意

大利等国家则影响力较小。

提前规划一个不可预测的英国脱欧，在大多数国家，受访者都设想用另一个强大的科研伙伴取代英国和/或加强该地区内外的现有联系。一方面，一些参与者，特别是学者，渴望继续与英国同事合作，无论英国脱欧采取何种形式。另一方面，大多数科研参与者都持有务实的观点和新的策略，以尽量减少英国脱欧对其国家体系和院校带来的成本；这些通常意味着部分地将英国合作伙伴排除在合作之外。

对整个欧洲项目的威胁

欧盟成员国在英国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英国院校的科研生产力和声誉也帮助该地区在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取得了很大的知名度。

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突出点是，不仅要关注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质量与声誉，还要关注整个欧洲项目的未来。如果英国与欧盟的联系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惩罚”中被完全切断，那么欧盟的声誉将会面临压力。另一方面，英国的优惠条件和更积极的结果可能会鼓励其他地方的反欧盟运动。这将向潜在的国际申请者发出相当排外的信息，并最终使整个欧洲项目面临风险。因此，英国脱欧在整个地区的许多不同层面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注：本文的完整报告题为“高等教育和脱欧：当前的欧洲观点”，可在 <http://www.researchcghe.org/publications/higher-education-and-brexit-current-european-perspectives/> 上查阅。

印度与中国：亚洲的两大高等教育中心

P.J. Lavakare

前印度政府科学顾问委员会 (the Science Advisory Council) 秘书、印度美印教育基金会 (the US - India Education Foundation) 执行董事

电子邮箱: lavakarepj@gmail.com

印度和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学生在亚洲学习潜在的主要中心。两者都拥有大量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自两国的学生都热衷于进入全球就业市场。正是这一挑战要求这两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培养出具有全球市场所需的高水平、高质量、多样化和国际教育背景的“全球公民”。国际高等教育还涉及在当地高等教育机构注册的多元化国际学生群体。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吸引大量的国际学生进入其系统。本文简要回顾了印度和中国的国际教育状况，并重点介绍了这两个系统的一些关键参数。

高等教育基础设施

印度有 799 所大学和近 3.8 万所（主要是本科）附属学院；中国有 2 880 所大学。两国的在校人数分别为 3450 万和 4790 万人。两个系统都鼓励建立私人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已做出了巨大努力重点发展其 100 多所大学，其中 7 所现已进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世界大学排名”前 200 名。印度一直在修补一些改革措施，试图发展其顶尖大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所印度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 200 位。尽管英语是大多数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语言，但由于其排名不佳，无法吸引国际学生。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已经不遗余力，且正在一些优秀大学开展英语授课。中国以英

语授课的医学院校甚至吸引了来自印度的学生，因为中国政府确保这些院校得到印度医学委员会 (the Medical Council of India) 的认可。印度没有进行任何这样的重大改革来吸引国际学生。此外，中国还设立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作为中国教育部下属的非营利组织，为在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该委员会也为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协调高等教育部门的印度机构，即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没有任何此类推进措施来吸引国际学生或鼓励印度学生获得国际体验。显然，中国的教育基础设施对国际教育和国际学生都更为有利。

印度和中国的学生流动

向内和向外的学生流动已成为国际化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 年，有 181 872 名印度学生在海外学习，而在同一时期，有 523 700 名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印度不限制在海外学习，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没有提供很多奖学金机会。虽然印度经济增长稳定，但中国已出现大幅向上和向下的变化。但趋势很明显：中国热衷于让学生到国外学习，并采取具体措施为他们提供国家奖学金。在印度，一些像印度理工学院 (the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这样的精英机构最近

为其工科学生开设了一些海外实习项目，并获得了一些奖学金支持和合作机构的帮助。从长远来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劳动力肯定会为寻求海外就业的印度年轻人带来激烈的竞争。中国人正在提升其英语语言技能，这些技能多年来一直是印度学生的一大优势。

印度和中国的国际化计划中最显着的变化是接收国际学生。2015 年，印度仅吸引了 42 420 名国际学生，而同年，中国则吸引了 397 635 名国际学生。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重点计划，即留学基金委不仅有助于集中招收国际学生，而且还根据他们的成绩为其提供奖学金。印度尚未建立这样一个中央协调机构。这一举措的影响是，全球 10% 的流动学生正在中国学习。中国甚至成功地吸引了印度学生，中国的印度学生人数从 2008 年的 8 145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16 694 人。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中有 80% 正就读于以英语授课的本科医学学位。相比之下，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的全印度高等教育调查（the All India Survey for Higher Education）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2016 年间，仅有 185 名中国学生在印度学习。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学习商业、管理、计算机科学和其他科学。这种不平衡清楚地表明，在亚洲，中国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教育中心。

为吸引国际学生（并为其学生提供国际素质教育），中国鼓励四所经认可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校。印度对希望在印度建立校园的外国教育机构的政策非常严格。结果，没有一所外国院校被吸引到在印度建立一所分校。

结语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非常庞大且可比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两者都有可能吸引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国际学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中国已经认识只有进行改革才能使其高等教育更为国际化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中国的七所大学目前在全球排名中位列前 200 位，吸引的国际学生数量是印度的 10 倍，同时它也确保了其大部分学生在国外接受教育。印度没有做出这样的努力。因此，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超过印度学生，并以其优势进入全球就业市场。中国向优质的外国大学校园敞开大门，吸引外国和本地学生。除非印度采取非常积极的措施改革其高等教育体系，否则它将在与中国竞争成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教育中心的过程中败下阵来。高等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和商务部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项新计划，通过高等教育确保经济发展。

日本的“超短期”留学：戏剧性的增长

新见由纪子

日本一桥大学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法学研究院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aw) 和全球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Global Education) 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yshimmi@gmail.com

据报道,自 21 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学生一直在发展一种“内向型”态度(一些可能的原因请见新见由纪子发表在《国际高等教育》2012 年第 66 期的文章)。最近,参加“超短期”留学项目的学生数量急剧增加,留学持续时间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根据日本学生服务组织 (the Japan Student Service Organization) 的数据,参加此类超短期课程的日本学生人数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间增加了两倍多,从 16 873 人增加到 60 145 人。这反映了大学生,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全球趋势。本文讨论了日本这一趋势的背景以及新出现的挑战。

日本政府的新留学政策

在战后时期,日本政府国际化政策的核心重点是吸引国际学生前来日本留学。然而,随着 21 世纪后期日本学生出国留学人数的减少,政府(在安倍管理下)开始优先推动向外出境流动,以培养日本企业的全球化劳动力。在此之前,出国留学主要被视为个人选择,政府对日本学生出国留学的支持有限。在推动海外学习的过程中,政府增加了针对单个学生的奖学金,并为大学提供了有竞争力的资金,以开发支持系统,扩大海外留学的选择范围。

在奖学金方面,政府于 2008 年增加了日本学生服务组织留学奖学金的预算,用于在日本大学就读的学生。目前,该奖学金可授

予参加其大学海外留学项目的学生,持续时间为八天至一年。奖学金获得者数量从 2008 年的 627 人急剧增加到 2017 年的 2.2 万人。此外,2014 年,政府还制定了另一项名为“起飞!”(Tobitate!)的青年大使项目(鼓励学生出国留学的公私伙伴关系)的奖学金计划,由政府 and 私营公司提供资金。“起飞!”奖学金适用于在国外学习 28 天至两年不等的学生。到 2017 年,约有 3 000 名大学生通过该奖学金在国外留学。

关于大学的竞争性资金,自 2011 年以来,大学间交流项目 (the Inter-University Exchange Project) 为日本与每年指定的地区之间的双向交流提供资金。通过这一项目,到 2017 年,在海外留学的日本学生人数达到了 14 712 人,而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人数达到了 15 289 人。此外,从 2012 年到 2016 年,“走向全球”项目 (Go Global Japan Project) 为 42 所大学提供资金,以开发海外留学项目,帮助学生掌握新的全球社会的能力。受助大学的目标是通过该项目向国外派遣 58 500 名学生。其他项目,如 2014 年开始的全球顶尖大学项目 (the 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gram) 等,也旨在激励日本学生到国外学习。

意料之外的结果和挑战

虽然这些奖学金和助学金并非特别适用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但大学特别增加了海外超短期课程的机会,因为出于多种原因,它

们似乎更容易被日本学生所接受。首先，该项目的较短期限可以防止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冲突，例如在日本公司寻找工作，这通常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期进行；准备国家资格考试；参加俱乐部活动等。其次，超短期课程需要的参与费用往往比较长课程更低。第三，在基础水平上专注于外语学习的超短期课程在日本学生中很受欢迎，因为许多学生没有足够的外语技能参加更长时间的交流课程，在此期间他们需要在合作大学与当地学生一起学习课程。

最近的政府支持有效地（至少是）增加了超短期课程的留学生人数；相比之下，长期项目的参与者人数没有增加太多。此外，虽然参加短期留学项目可以成为“内向型”学生向其他文化开放的一步，但与长期计划相比，超短期留学项目被认为时间太短，无法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跨文化能力。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评论。

培养“外向型”学生

在目前超短期留学海外参与者数量增加的基础上乘胜追击，为学生提供回国后继续

发展其全球能力的机会至关重要。举例来说，鼓励学生参加更长期的课程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努力减少现有的障碍，提供充足的奖学金，解决与公司招聘系统相关的问题，并建立机制以让学生轻松转移在国外获得的学分。母校校园的国际交流机会应该在课程活动中得以增加，例如，通过英语授课的课程和课外活动（如：语言交换、辅导、同伴支持和伙伴系统）。

此外，为了回应目前对超短期留学项目效果的疑问，重要的是进行评估，对课程效果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衡量，并继续提高这些超短期课程的质量。收集并评估短期留学体验对培养学生全球能力发展的效果与作用，是建立支持的必要条件。这些最近开发的超短期课程主要面向具有基础语言水平的学生；更高级的课程则需要高水平的外语和跨文化技能（例如与主办国当地学生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这可以成为学生继续发展其能力的另一种选择。在超短期留学项目中为学生创造一个利用和发展其留学经历的环境，这将成为培养未来“外向型”毕业生的机会。

衔接学院：加拿大新的院校形式

Dale M. McCartney and Amy Scott Metcalfe

Dale M. McCartney: 加拿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教育研究系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amy.metcalfe@ubc.ca

Amy Scott Metcalfe: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系高等教育副教授

电子邮箱: dale.mccartney@alumni.ubc.ca

国际本科生是许多高等教育系统学费收入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财务紧缩的政府支持下降的背景下。为了增加国际本科生招生,加拿大大学正在与“衔接学院”(pathway colleges)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直接接纳此类学院。衔接学院是半自主或私立机构,与合作大学签订转学协议,为缺少学术或语言证书的国际学生提供入学途径,允许他们直接进入大学阶段的本科学位课程。虽然其他国家都有衔接学院,但在加拿大,这种形式相对较新,而在这一点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很少,但它引起了学院对兼职教师的依赖,他们增加了学院“公司化”的潜力,也增加了一些国际学生可能会被推广资料误导的可能性,学生们以为自己可以转学到加拿大名牌大学。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呼吁更多地关注衔接学院的政策和实践。借鉴加拿大的数据,我们提供了这些院校的简要类型,确定了其对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及因此而带来的一些可能的担忧,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方向。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研究了从属于加拿大大学协会 (Universities Canada) 的 96 所院校,这是在该领域由国家倡导建立的组织。与衔接学院之间建立关系在加拿大

公立大学中越来越普遍:我们的研究显示,96 所院校中有 69 所,即 72% 的学校与至少一所衔接学院有联系。由于衔接学院是加拿大的一种新的院校模式,其所采取的形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的研究揭示了三个有用的比较轴,让我们了解加拿大衔接学院现象的一般形态:所有权、课程和转学机制。

所有权

我们注意到加拿大衔接学院的两种所有制形式:私立合作办学或公立主办院校拥有的学院。在与衔接课程有联系的 69 所大学中,有 22 所 (32%) 与衔接学院有关系,这些学院是私立的营利性机构。这些私立衔接学院通常由大型国际教育公司 (如纳维教育 [Navitas] 或学习集团 [Study Group]) 所有,并与合作大学分开运营。这些私立衔接学院承诺学生的学术或语言水平将得到“升级”,并明确宣传学生将有机会就读于合作院校,以此作为其招生材料的一部分。其余的衔接学院 (68%) 归主办院校所有。这些由大学主办的衔接学院与合作院校本身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自己的录取标准,且学生就读的大部分或全部课程与其他学生群体区分开来。

课程

加拿大的衔接学院也可根据课程进行区分。在我们样本中的 69 所衔接学院中, 44 所 (64%) 提供混合的学术和语言学习课程。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课程的学术成分代表一年或四年以上的本科学位, 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少数课程。这些混合的学术语言课程为需要提升其语言或学术成绩以进入合作院校的学生提供额外帮助。较少数的衔接学院——25 所 (36%), 提供专门的语言或学术英语课程。在这些情况下, 学生将获得英语 (或是在法语地区的法语) 语言提升课程, 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满足合作院校的语言要求。由公立大学拥有和运营的衔接大学比企业合作制衔接大学 (其中 32% 是学术英语课程) 更有可能提供学术英语课程 (38%), 但混合课程在两种院校中都更为常见。

转学机制

有助于理解这种新兴院校形式的最终比较, 是向国际学生提供的衔接或转学机制的类型。少数衔接学院 (69 所院校中的 8 所, 即 12%) 要求学生在完成衔接课程后重新申请到合作院校就读。但是, 加拿大绝大多数的衔接学院 (88%) 都希望学生在成功完成衔接课程后直接进入合作大学。所有的企业合作制衔接学院都提供直接进入一个或多个院校的机会。直接可以就读大学是企业合作制衔接学院在与大学建立正式关系之前可能需要的有价值的招生工具。

讨论

根据加拿大的案例, 衔接学院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新院校形式。目前尚不清楚它们对现有院校的影响。但是, 我们看到私立高等

教育模式在加拿大等公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影响力提升的可能性。虽然国际和国内学生的差异化学费定价已引起了对企业定价模式的关注, 但衔接学院的模式允许院校及其管理委员会在公立大学内部进行私有化的“测试案例”, 许多国际和地方案例证明了公立大学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种效应在私立衔接学院及合作院校所拥有的衔接学院之间的形式相似性中已经可见。考虑到衔接课程代表了院校的重要收入来源, 通过扩大自费国际学生人数, 以及对每名学生增加一年的入学年数, 这不足为奇。在系统层面, 这些衔接学院可能会从社区学院那里抢夺国际学生的学费, 社区学院也积极寻求从海外招收学生。通过这些方式, 衔接学院已在改变高等教育的格局。

我们需要更多研究来衡量衔接学院影响力的程度。在加拿大, 人们的一种担忧是衔接学院可以激励院校接受那些不太可能在合作院校顺利完成学业的学生。另一种担忧是, 衔接学院的学生不会获得与主办院校学生相同的学术或服务, 并可能会把他们与咨询、监察员或其他支持系统隔离开来。同样, 初步研究表明, 衔接学院强调创收 (在某些情况下是利润), 这就意味着教师和工作人员更有可能不会组成工会且不具备稳定性。由于衔接学院对整个公共系统的影响可能意味着竞争压力, 这将推动其他院校采用类似的模式, 因此, 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研究。

也许更重要的是, 在国际背景下研究这些衔接学院。许多公司合作伙伴在几个国家开展业务, 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 不同的政策制度是如何影响并由此而产生衔接学院的? 我们质疑这些跨国公司如何或者是否可以标准化其世界各地的衔接学院, 这不仅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国际学生的流动, 还会影

响这种流动性的全球企业化程度，超出了通常被理解为招收代理和招生申请准备的问题。我们将衔接学院视为向高等教育政策环境转变的代表，该政策环境能够实现更加相

互依赖、更为国际化和更为“灵活化”的模式，来挑战高等教育系统的假设以及挑战公立/私立教育领域的概念。

包容性国际化：增加入学机会和公平

Hans de Wit、Elspeth Jones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Elspeth Jones: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级教授

电子邮箱: e.jones@leedsbeckett.ac.uk

国际化不是高等教育中的孤立现象；它嵌入在全球舞台上更广泛的高等教育背景下。精英主义、商业化、高学习成本、腐败、欺诈、数量与质量都是国际高等教育的共同主题，它们影响着国际化，反之亦然。一种包容性方法必须考虑到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口背景，必须解决当前国际化政策和做法不具有包容性且忽略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学生的问题。

两个主要的悖论

在高等教育中，我们面临着两个主要的悖论。首先，虽然我们可能正在努力加强国际化和全球参与，但在许多国家，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势导致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脱节。其次，虽然学分和学位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但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只能吸引一小部分精英学生，却丢下了全球 99% 的学生。

尽管大众化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它已经增加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机会与公平一般来说是个问题，但对国际教育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们知道国际经验的许多好处以及许多驱动因素。然而，在一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只有 1~2% 的学生有学位流动经历，且可能具有负面内涵，从输出国的角度来看，

被视为人才流失。

谈到学分流动/出国留学的话，这被视为学生国际化的关键途径。然而，在欧洲和美国以外，学分流动学生的比例甚至低于就读学位课程的学生。换句话说，尽管流动性在国际化政策和实践方面获得的关注最多，但只有极少数学生参与其中。英国大学最近发现，以高级管理和专业管理为背景的学生，其流动的可能性几乎是长期失业学生的五倍。此外，流动学生比非流动学生获得更高的大学课程成绩和工资，这对那些已经享有特权的人来说意味着更大的优势。此外，在收入、种族、移民历史或残疾方面缺乏代表性。

渐增的短期流动

增加获得流动的机会并不容易，资金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增加流动数量的一个尝试是凭借更多的短期流动机会。我们知道即使是短期流动（工作安排、学习或国外志愿服务），也可以产生诸多好处，包括可转移的技能，如：团队合作、团队领导、组织技能、项目管理、问题解决、人际网络、调解技能、冲突解决、决策制定和人际交往能力等。短期流动还可以培养跨文化能力技能，如：承担风险的意愿、耐心、敏感、灵活、开放、谦逊、尊重和创造力。

至 2020 年，48 个博洛尼亚进程签署国的欧洲流动参与目标为 20%，而在美国，按计划将海外留学人数增加一倍将带来相似的百分比。然而，即使达到这些目标，也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即 80% 的学生，将无法获得本文提到的福利。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接近 99%。流动性可能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它不足以实现包容性的国际化。

将流动性纳入课程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流动性视为国际化课程的一个方面，将国际化学习成果纳入其核心，从而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国际化体验。邀请学生反思其出国留学精力有助于巩固其学习成果，并为他人提供多样化的视角。这同样适用于在课堂上积极吸引来自不同地区、国家、使用不同语言和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这是各种评论家建议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的方法。它本身不会使课程国际化：我们需要对课程内容、教学法、评估和学习成果进行更基础的审查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它支持将选择性观点纳入学习、教学和评估过程。

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方法

我们认为国际化政策未能解决那些有国际化倾向的所有人的问题，且应该重新关注那些不参与国际旅行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在我们将包容性的国际化纳入所有学生的经历

之前，我们冒着使我们努力抗争的那种精英主义永久化的风险。如果我们想解决这两个悖论，那么关注流动性会适得其反。它排除了大多数学生，并证实了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论点，即事实上它是知识精英主义。

包容和全面的国际化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想法，无论我们生活的背景如何。所有人的国际化应该成为院校战略的起点，这反映出所有学生作为公民和专业人士，必须为其未来的生活参与这一议程。

总之，要使国际化具有包容性而非精英主义，它必须解决入学机会和公平问题，并要求我们：

- 将国际化纳入本土领域，这对所有人的国际化至关重要。
- 认识、重视和利用课堂多样性，为学习课程带来另类视角——来自国际学生，有国际流动经验的本国学生以及来自当地不同社区的学生。
- 让整个院校参与到实现包容性国际化的过程之中。
- 在科研、教育和服务三个方面中将本土与全球元素相互链接。
- 关注区域和全球伙伴关系，以帮助实现包容性的国际化议程。

注：本文是作者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发表于第 486 期《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上文章的更新版本。

实现大众化的价值

Fazal Rizvi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教授

电子邮箱: frizvi@unimelb.edu.au

自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体系迅速扩大。根据特罗 (Trow) (2006) 提供的定义,不只是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已经实现“大众化”——或正变得如此。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正如这个成功故事一样引人注目的是,我们不应该认为“大众化”是明确的,且必然是一件好事。虽然学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是令人兴奋的原因,但大众化引发了一系列应广泛讨论的问题。

首先,需要认识到高等教育中毛入学率的增长往往反映出各国经济繁荣以及社会和政治信心的提高。当这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时,不可避免地会考虑扩大其高等教育体系,以利用全球资本流动、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和全球供应链。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世界各国政府已准备好将大笔公共资金分配给高等教育;推动私人投资,促进新的大学和学院的发展;并鼓励公众将高等教育投资视为可能为个人和国家带来良好回报的支出。

过快且特别

在这种思路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并标志着它的繁荣和声望。然而,重要的是要考虑毛入学率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否过快,而且其形式过于特殊。我们需要问一下,各自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系统是否能够应对变化的步伐。在多大程度上是需求刺激

了对大众化的推动,而不是通过适当考虑供给问题——通过机会主义而非政策分析和发展的系统过程。

随着发展中经济体中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们需要询问政府在充分准备其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张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提供适当的支持、资源分配和能力建设。是否有一批经过适当培训的学术人员可供使用或准备好照顾新一批学生的需求(其中许多学生来自缺乏高等教育传统的家庭)?大多数政府试图通过允许学生进入一系列私立院校来“吸收”需求,这些私立教育提供者具有不同程度的承诺、专业知识和资源,以提供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这些匆忙建立的私立院校所面临的批准和质量保证程序是不均衡的。此外,重要的是要问政府官僚机构本身是否具备开发和实施协调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工作所需机制的专业知识。

技术的使用经常被认为是以合理的成本满足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的可行选择。然而,世界各地的经验表明,如果要正确和可持续地进行在线学习,那么在线学习往往比传统的“实体”教育更加昂贵和复杂。如果认为可以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下廉价且快速地开发该领域的教学专业知识,这种假设本身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通过对现有的技术学校、理

工学院和师范学院进行改造或更名而创建的，而不会在其预期运作的方式上或是他们招募的学生类型上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许多学校资金严重不足，被广泛认为是“过度拥挤的工厂”。它们缺乏作为一所体面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拥有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与此同时，很少有人为专业培养学术人员而设计教育系统。虽然并非所有在高等教育机构工作的员工都需要成为研究员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但不能让一个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机构忽视其责任，它们要确保其教职员在其学科领域拥有先进的知识水平或是具备学术热情。通过这种方式，能力建设任务应被视为任何大众化尝试的核心。

能力问题

在急需建立新大学和扩大现有大学而不过分关注能力建设的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选择必然狭窄，往往局限于不需要昂贵实验室、高库存图书馆和高素质员工的科目。例如，商业和管理课程被认为性价比较高且对许多新生来说有能力负担，因此，这类课程近几十年来经历了爆炸式增长，而急需的 STEM 领域的课程数量有限。结果，某些学科领域的毕业生供过于求，而其他领域则相对缺乏。此外，许多毕业生不具备雇主认为的在面向全球经

济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往往无法在其学习领域找到工作；因此，从长远来看，产生的风险是高等教育体系可能会在毕业生中产生合法性和动机危机。这些毕业生也无法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为国家经济服务是政府希望从高等教育系统大众化获得的益处。这表明大众化不一定是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目的和结果，组织和协调方式，以及它对全球经济所需知识和技能发展的贡献。

因此，高等教育中毛入学率的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但却不足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此外，还需要更全面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这将涉及重新构想并更新课程和教学方法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结构和管理方式。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能力建设以及在规划和质量保证方面的适当措施。因此，实现大众化的形式问题应该成为关于扩大高等教育体系的辩论的核心。关于高等教育目的的更广泛的问题同样重要，它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而且与社会和文化发展有关。仅依靠新兴的高等教育市场力量无法实现这些必要条件。

注：本文是发表于《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的高等教育》杂志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上文章的修订版，该杂志是新加坡基金会的出版物。

菲律宾优质高等教育的普及

Miguel Antonio Lim、Sylvie Lomer、Christopher Millora

Miguel Antonio Li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菲律宾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国际联系办公室 (the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Linkages) 顾问

电子邮箱: miguelantonio.lim@manchester.ac.uk

Sylvie Lomer: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讲师

电子邮箱: sylvie.lomer@manchester.ac.uk

Christopher Millora: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博士研究生、曾为菲律宾伊洛伊洛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loilo) 讲师

电子邮箱: C.Millora@uea.ac.uk

全世界越来越关注谁来支付大学学费的辩论。与其他政府相比, 菲律宾当局最近推出了补贴支付所有就读于州立大学和学院的菲律宾学生的学费。这项《普及优质高等教育法案》(*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Act*) 已于 2017 年 8 月 3 日签署成为法律。它承诺“提供足够资金……以提高所有高等教育社会经济阶层的参与率。”补贴适用于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本科学位。该法案还增加了最贫困人口可获得的基于收入的贷款。

有人担心该政策会导致学生从私立院校转入公立院校。由于宪法承诺维持公立和私立团校, 该法案允许以相当于最接近的州立大学和学院的比率对私立院校的费用进行补贴。学生还可以从书籍、学习用品、交通、住宿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支持中受益。该法案反对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收费增加的趋势。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菲律宾参议员本杰明·阿基诺四世 (Benjamin Aquino IV) 建议, 提供免费教育将“打开通往更光明未来的大门”, 从而“赋予更多菲律宾人以大学文凭的承诺。”这在菲律宾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它

们重视高等教育资格。

最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明显增加, 从 2010 年的 48 447 万美元增加到 2016 年的约 10 亿美元, 尽管人均支出仍相对较低。菲律宾宪法要求教育在国家预算中占最大比例, 联邦当局已拨出 7.93 亿美元 (预算的 1%) 用于在 2018 年引入上述补贴。国民经济在中期预计将增加 6% 以上, 这一补贴政府似乎也能负担得起。然而, 虽然这项措施在政治上很受欢迎, 但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支持与反对

该法案主要是为了减少辍学率: 目前只有四分之一的高等教育学生毕业。该法案旨在帮助那些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人。这种支持不会重新分配资源, 而是帮助那些在学习的最后阶段遇到困难的人。该法案还旨在提高质量。菲律宾的高等教育机构由高等教育发展委员会 (th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管理, 该委员会负责监督、评估和管理质量保证和质量增强。该法案最初包括每个州立大学和学院的入学人数上限, 只有当州立大学和学院符合监管机

构制定的更高质量标准时才能增加入学人数。但是，在该法案的最终版本中，人数不再有限；州立大学和学院将能够自己设定招生人数。

利益相关者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首先，菲律宾已有诸多计划来改善受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州立大学和学院已经得到政府补贴，学费明显低于私立院校。“社会化学费”制度也意味着学生按家庭收入的比例支付。其次，该法案不均衡地使中上阶层受益，因为大部分州立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来自中等至富裕的家庭。只有 12% 的就读于州立大学和学院学生来自占比 10% 的最贫穷的家庭——而 17% 的学生来自占比 10% 的最富有的家庭之中。该法案的特点是具有“意想不到的倒退影响”。全国学生联盟 (the 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表示担心，他们认为州立大学和学院可能会提高其他费用以弥补其对学费收入的控制不足。补贴不会自动涵盖这些费用，并可能进一步“惩罚”最贫困的学生（因为学费仅占学位总费用的 20% 至 30%）。第三，降低学生成本可能会导致学生从私立和公立院校中退学。在菲律宾的 1 943 所高等院校中，88% 是私立院校，12% 是公立院校。大约 54% 的学生就读于私立院校，46% 的学生在公立院校就读。鉴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已经增加，人们担心这一举措可能会极大地改变这一行业。这与将义务教育从 11 年延长至 13 年的举措相结合。在 2018 年结束的过渡期间，较小的同龄人群已经进入大学，因为学生已经在中学继续学习了一年。这影响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财务状况，给私立院校带来了特别的压力。学生外流也可以通过教师的迁移来反映，因为私立院校的工资往往较低，而州立大学和学院则支付标准化

的政府工资。

结语

该法案的潜在影响超出了经济效率并针对特定的经济群体。它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所有人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针对来自贫困家庭苦苦挣扎的学生。“生活梦想”的修辞建立了一种基于优秀和工作的对繁荣的描述，其中高等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关于这一举措的可持续性存在重要问题。原则上，该法案允许所有菲律宾人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并承诺“提供足够的资金”，可能实现普及化。菲律宾的人口年轻且不断增长：15~24 岁的人群从 2006 年的 1 760 万增加到 2016 年的 1 990 万。随着“K-12”过渡期的结束，更多的学生将进入高等教育。鉴于菲律宾人对高等教育“梦想”的强有力支持，我们预计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将大幅增加，这在准备该法案预算时可能并未设想到。在法案的最终版本中，学生入学人数没有限制，这证实了扩大高等教育部门的意图，鼓励州立大学和学院领导人通过增加学生人数来增加收入。这可能会加剧学生和教师从私人院校到公共院校的转移。由于经济不断发展，该法案在短期至中期内可以负担得起所需费用。但对学生数量迅速增加的担忧使其长期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若不实行此项政策，菲律宾能否承受后果呢？为使该国作为知识经济体与其区域竞争对手竞争，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可能会提供竞争优势。凭借其庞大的服务部门和快速的工业化，菲律宾有充分的条件利用通过扩大高等教育入学率来发展知识劳动力。

科学出版社的“香槟塔”

Sabina Siebert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亚当史密斯商学院 (Adam Smith Business School)
管理学教授

电子邮箱: sabina.siebert@glasgow.ac.uk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生命科学领域的出版物呈急剧增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2000 年间, 出版物的数量大约每 14 年翻一番, 但最近, 这一比率进一步增加, 大约每 12 年翻一番。一方面, 这种增长可以被视为对科学投资的积极影响, 特别是在新兴经济体中, 这应该会带来更快的科学进步。然而, 另一方面, 已发表论文数量的急剧增长意味着期刊编辑被出版物“淹没”, 他们发现这些出版物很难处理, 而科学家发现它们更难以保持优势。产生的科学越多, 系统中的噪声就越多, 科学家就越难以说出什么是值得信赖的, 什么是不值得信赖的。因此, 科学家越来越关注科学界控制不断增加的科学产出质量的能力。

顶级期刊出版空间的稀缺性

在我的一项由英国国家学术院 (British Academy) 资助的研究中, 我通过提问来调查科学出版物中溢出的性质: 提交的论文如何在期刊之间分发? 不出所料, 我发现在如《细胞》(Cell)、《自然》(Nature) 或《科学》(Science) 等顶级期刊中发表文章似乎是科学的圣杯, 因为它保证了学术职位、资助和编委会成员资格。科学家事业的成功取决于在这些著名期刊上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此外, 科学家表示, 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增加他们未来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但这些期刊保留了人为的空间稀缺性, 这就是尤恩 (Neal Young) 及其同事在 2008 年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将其称为“赢家的诅咒”。作者将著名期刊中的人为篇幅限制比喻为经济学中的人为稀缺, 以限制商品的供应。过去, 在网络期刊出版之前, 对印刷页面的限制是有限的, 因此出版时隙的稀缺性是合理的; 但现在, 除了以极低的接受率来表明成功作者的高地位, 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解释期刊的高拒绝率。

生命科学期刊中的层次结构

那么, 被这三个顶级期刊拒绝的论文会怎样呢? 传统的回应是, 论文被拒的大多数作者都会改投较低层次的期刊, 有些人选择较小的专业期刊作为其出路。然而, 最近, 将文章在期刊层级中层层递减的机制变得流行。一些期刊在获得作者许可的情况下, 将被拒绝的论文转交给有时被称为“姐妹期刊”的同一品牌。例如, 《细胞》、《自然》和《科学》的期刊家族现以自己的品牌开办较小的期刊, 并将这些期刊作为已被顶级期刊拒绝的优质作品的出口。例如, 在作者的许可下, 《科学》期刊将论文转移到其姐妹期刊《科学免疫学》(Science Immunology)、《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科学机器人》(Science Robotics) 或《科学信号》(Science Signaling) 之中。这种转移机制的既定目标

是帮助作者找到一个尽可能快速、顺畅地发表论文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做法对作者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论文发表得比其他人更快。对于期刊家族而言，转移的做法也具备良好的商业意义，因为它允许出版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我采访过的一位编辑评论说：“如果你得到一份论文，对其进行评审并拒绝了它，那么财务模型会告诉你，你没有赚到钱，你花了钱，但你却没有做任何事。如果你可以级联它……它会在你的较低等级的开放存取期刊中发布，但是你现在通过这份论文获利了。”而且，不出所料的是，开放存取的期刊通常收取大量的出版费。”

一些小型期刊的编辑们担心这个系统会加强最大品牌的垄断，因为姐妹期刊会吸收被拒绝的论文。一些中小型专业期刊编辑表达的担忧是，过去提交给期刊的论文现已发表在三大家族《细胞》、《自然》和《科学》所拥有的期刊上。一位期刊编辑评论了《自然》期刊品牌的力量，“《自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品牌之一，甚至比大多数时尚品牌更强大。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涌向这些期刊、仅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声望，质量和科研的成功。”

不可否认的是，找到一个尽可能快速、顺畅地发表论文的期刊对所有作者都很重要，因此降级安排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事实上，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些作者认为这些安排是这一进程的标准——例如，他们将论文提交给《自然》，因为他们知道可能会被收录进《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之中。然而，较小的专业期刊的编辑担心这一趋势，因为他

们觉得自己被大品牌挤压了。虽然大型期刊的论文提交数量有所增加，但中级专业期刊（主要是影响因子低于10）的论文提交数量下降，且其出版物市场份额下降。这些较小的专业期刊的大多数编辑都希望看到其论文提交量上升，但正如一位编辑悲观地评论道，“这个市场的未来在于对提交的论文展开竞争。”

生命科学期刊的“香槟塔”

我认为最能捕捉科学出版等级性质的比喻是香槟塔的比喻。正如塔中的酒杯被分层排列一样，科学期刊也是如此，顶级的著名精英期刊（如《细胞》、《自然》和《科学》等）位于顶端，最低排名的期刊位于底层。在它们之间是根据其影响因子按递减顺序排列的各种级别的期刊。当被顶级期刊拒绝时，提交的论文就像香槟一样会在香槟塔上缓缓下降，在下来的路上被比喻为“失去泡沫”（失掉了竞争力）。期刊编辑有时会表达一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即最终所有文章的内容都会在某个地方得以发表（无论是在顶尖期刊还是在底层期刊之中）。因此，如果较低级别的期刊吸收被拒绝的论文，那么值得考虑谁拥有这些“香槟杯”——这些较低级别的期刊是由科学协会运营的小型专业出版物呢，还是由大家族拥有的期刊？谁从这些安排中受益，谁又输得一干二净？我研究的这一操作目前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很常见，但它在社会科学中也越来越多地被试用。在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做法之前，我认为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应仔细考虑其优缺点。

高等教育期刊：一个新兴领域

Malcolm Tight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m.tight@lancaster.ac.uk

可以说，高等教育期刊是高等教育科研产出最重要的知识库。因此，无论您是高等教育研究人员还是对高等教育研究感兴趣的人，重要的是了解其相关信息。高等教育期刊有多少本？它们关注什么？谁拥有它们？它们在哪里？它们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它们发表了多少论文？哪个期刊最好？未来会是什么情况？

本文总结了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的结果，但必须强调的是，所提供的答案并不是确定的，而且这也是个不稳定的领域。该研究仅限于以英语发表的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专门关注高等教育研究。当然，有许多非学术性的高等教育期刊和其他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还有许多高等教育期刊以中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俄文、西班牙文和其他语言出版。虽然这些都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但它们都值得研究。

高等教育期刊有多少？它们关注什么？

即使有这些限制，这也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没有明确的学术期刊清单。在学术界，每年都会设立新的期刊；现有的期刊被撤销，更名或是合并。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本身保留了一份清单，但其中包括一些并非完全专注于高等教育的期刊，还有一些非学术性的期刊。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每次提到未知期刊时我们都会记下新标题，然后在网上搜索更多详细信息。在此基础上，迄今已确定了 121 种目前以英语出版并完全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学术期刊。（如果声称这份名单是全面的，那将非常愚蠢：这怎么可能呢？有些期刊会被遗漏，特别是新的期刊只能在网上找到，它们专注于一门学科，和/或设立在一个相对模糊的机构中。）确定的大多数期刊（79 本）侧重于特定话题、主题或领域。例如，有关于评估、社区学院、多样性、参与、国际学生、管理、拓展、政策、质量、宗教、科研、学生事务、教学、女性和基于工作的学习的期刊。相比之下，通用的（19 本），以学科为重点的（19 本）和以国家为重点的（4 本）高等教育期刊不太常见。

谁拥有这些期刊？它们在哪？

这些期刊中，学术社团（例如全美院校研究协会[AIR]、全美学生人事管理协会[NASPA]、英国高教研究学会[SRHE]）拥有的期刊和由其出版商拥有的期刊（例如 Springer, Taylor & Francis）之间相当平均。对于几个主要最近建立的在线期刊，我们无法确定其所有权。在原产国方面，56 本期刊最初在美国建立，28 本在英国，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各有 6 本，在其他 8 个国家有 9 本。对于余下的 16 本期刊，我们无法确定其原产

国。

期刊的国家或国际聚焦的指标可以从其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中发现（这些信息无法在七种期刊中找到）。54 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完全由一个国家的学者组成；其中大部分（47 本）是美国的。有 42 本期刊有国际编委会。其余 18 本期刊可能被称为“多样化的”编辑委员会，其中大量成员位于一个国家，其余成员分布在世界各地。

这些期刊有多少年历史了？它们发表了多少文章？

最古老的期刊《学术医学》（*Academic Medicine*）于 1926 年开始出版，随后是 1930 年第一本通用高等教育期刊《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这也是第一本在美国以外出版的高等教育期刊；接着到 1947 年，《高等教育季刊》（*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开始发行。高等教育研究出版在 20 世纪 70 年代真正起飞，在 10 年中创立了 18 种新的（幸存下来的）期刊，当时共有 40 本高等教育期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又增加了 12 本高等教育期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增加了 15 本。自 2000 年以来，已确定的有 54 本期刊。但是，不应忘记的是，至少有十几种高等教育期刊在此期间停止发表，而其他期刊则在合并后失去了原有的名称。

在出版量方面，“最大”的期刊是《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在 2016 年，它发表了 2 286 页内容的文章。其次是《学术医学》，内容有 1 707 页，再次是《高等教育》，内容有 1 646 页。总共有 14 种期刊在 2016 年发表了超过 1 000 页内容的

文章。另一方面，有一些期刊发表的内容不到 100 页；这些期刊通常是最近创设的和/或高度专业化的。在发表量介于这两类期刊之间的其他期刊中，其发表量在 2016 年为超过 4 万页的文章。如果我们假设每个打印页面平均有 400 个单词，那么这相当仅在短短的一年内它们就发表了大约 1 600 万个单词的内容！

那本期刊是最好的？未来情况又会如何呢？

可选的期刊排名系统可通过 SCImago 期刊排名指标获得，该指标根据相对引用率对各种期刊进行比较。排名最高的高等教育出版物是专业期刊之一《互联网和高等教育》（*Internet and Higher Education*），2015 年发表的文章影响因子排名为 3.561。其次是《学术医学》（2.202），然后是三个综合高等教育期刊，它们的排名非常相似：《高等教育研究》（1.724），《高等教育》（1.717）和《高等教育评论》（1.703）。其他八种期刊的排名分数超过 1.0。排名最高的 13 种高等教育期刊既包括最古老的期刊，也包括一些相对较新的期刊，包括产量最大的期刊和一些产量相对较小的期刊，7 种是国际性的，3 种是美国期刊，3 种有着“多样化的”编委会。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以及对科研的兴趣的增长，高等教育期刊及其文章的产出将继续增加，这是可预期的。期刊的印刷版本将很有可能不复存在，几乎所有出版物都在线形式呈现。期刊和文章的免费、开放存取趋势将继续发展，但是，完善的、高质量的期刊可能仍会收取相关费用。

消失的公立高等教育垄断

Daniel C. Levy

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育政策与领导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 Leadership) 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私立高等教育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急剧扩张通常是通过提高毛入学率以及提高私立教育入学人数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来定量描述的。在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有超过 6 千万名学生,占世界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私立教育的发展可以被视为对公立教育发展的主要补充,因为公立院校招生的增长本身在其原始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样有效的是承认私立教育扩张后最为明显的牺牲——公立教育的垄断几近消失。公立教育垄断只是指私人制度的缺失,无论是法律禁止还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打破公立教育垄断的私立院校可以是非营利性或营利性的;非营利组织是全球更常见的法律形式,但两种形式都在增长,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清晰。

公立教育的垄断长期以来一直是常态。在 1989 年及以后,这种教育形式在非洲、阿拉伯地区、东欧和亚洲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拉丁美洲早已消散,而许多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则是从垄断的公立教育部门发展到公私部门共存的教育环境。然而,在 20 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带来了公共垄断的急剧增加。私营部门也随后进行分散的国有化(如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

消失的公立教育部门垄断

但是,近几十年来,对公立教育垄断的

全球侵蚀并没有被误解。随着共产主义 1989 年在整个东欧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消亡,公立教育部门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突然缩减。除此之外,自 1990 年以来的每十年中,我们都能看到单一部门(公立教育垄断)系统的数量显著下降。

到 2000 年,主要国际数据库(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库)仅显示 39 个没有私营部门的国家;到 2010 年,这一数字为 24。这是 179 个国家中的 24 个有可用教育部门数据的国家。然而,对“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PROPHE)数据集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只有 10 个国家保留了公立教育的垄断,包括:阿尔及利亚、不丹、古巴、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希腊、卢森堡、缅甸、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尽管关于这一清单最重要的事实是其规模小,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缺少几个特定国家。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放弃了公立教育的垄断,随后是越南。这两个国家都拥有大约 15% 的私立教育。(朝鲜不在 179 个国家数据库中,但即便如此,奇怪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它有一所福音派私立大学。)正如中国和越南一样,土耳其允许私立高等教育但却不允许宗教高等教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左翼政权(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

都未曾威胁要中止私立高等教育。

此外,即使是仅有 10 个国家的名单也低估了现在公立教育垄断的有限性。首先,10 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有 3 个系统的总入学人数少于 1 万人,另 3 个系统的入学人数少于 30 万人。只有阿尔及利亚、古巴、希腊和缅甸在相当大的系统中保持公立教育的垄断。其次,一些国家(希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允许基本上是私人性质的国际或跨境教育的存在。在私立高等教育中,因没有国家认可的学位,其入学率被认定为零。同样,孤立的国内私立高等教育项目也未被列入官方认可的学位之中。

脆弱的十国

此外,10 个国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缅甸)已经就私立教育的创收进行了积极的公开讨论。有些国家起草了立法。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最大的系统中,针对私立教育发展的具体建议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许可申请通常是实际私立教育的前身。

一个显著的政治观察点亮了目前的清单,对其持久性有影响。政治制度显然倾向于左派(无论这个术语多么模糊)。的确,我们已经看到左派倾向并不能保证公立教育的垄断;左派政权与私立高等教育的兼容性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明显标志,即当代公立教育垄断的不稳定性。然而,它并没有否定这样一个现实,即“10 国集团”远比其他 169 个国家中的大部分国家更为“左派”。

古巴是最明显的例证。古巴是美洲唯一拥有共产党政权且没有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古巴还没有对潜在的私立高等教育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拉

丁美洲传统上确立的 20 个共和国中,乌拉圭是最后一个打破了公立教育垄断的国家,时间是在 1985 年。正如乌拉圭在该地区的情况一样,希腊长期以来在欧洲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在社会福利领域具有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规范。土库曼斯坦一般在“斯坦国”中较为左派(类似于对塔吉克斯坦的概括,该国最近才打破了公立教育垄断)。在半个世纪的独立中,缅甸在政治上的最佳特征就是镇压。阿尔及利亚的公立教育垄断不仅与其法国殖民传统(通常不及英国殖民传统对私利性的接受)有关,也与其左倾倾向有关。许多其他左翼政权打破了公立教育垄断的事实对于坚持公立教育垄断而言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在一些国家,初期活动也与潜在的私立创收有关。从广义上讲,当代在各种社会战线上都有着明显的私立化倾向。

一个独立的视角,不是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关于组织或世界体系倾向,可能只是强调形式一旦建立就趋向于传播。公立高等教育曾经只在一些国家存在过,然后才传播到几乎所有国家;私营部门现正在做同样的事。但无论公立教育的日子是否时日有限,或者它们是否终要回归,这里的要点不是预测。首先,对私人—公共事务的预测是令人担忧的;当公立教育的垄断是一个强有力的规范时,有多少圣人能确定即将到来的私立高等教育激增的维度?这里的要点是强调一个强有力的现实。双重部门(公、私兼具)是主要的新规范,这已扩散到几乎整个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的激增不仅因其总体规模而且因其近乎无处不在而引人注目。因而,公立教育的垄断已经变得相当罕见了。

重新思考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

Targino de Araújo Filho

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 (Federal University of São Carlos) 教授、意大利米兰卡托利卡德尔萨
克罗库里大学 (Università Cattolica del Sacro Cuore)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 (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sation) 访问学者、CAPES-PGCI 奖学金获得者

电子邮箱: targino@ufscar.br

最近,在《国际高等教育》杂志中,关于巴西高等教育的两篇文章关注的是私立高等教育:一篇关注私营部门营利部门的发展,另一篇则将该部门归类为巴西经济增长的推动者。私营部门占巴西 800 多万本科入学人数的 76%,由此,巴西被列为全球入读私立大学学生比例最高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对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进行更好的分析。

事实上,巴西高等教育的扩展一直伴随着私营部门的参与,主要由社区、宗教和慈善高等教育机构组成,并发挥着与公共部门相辅相成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取得了进展,1997年,私营部门学生占入学人数的 61%。随着营利性机构的合法化,该系统获得了新的动力。2015年,巴西新建了 2 364 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 2 069 所是私立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占入学人数的 50%左右。

采用商业逻辑

在大多数投资基金(多数来自海外)的支持下,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分部已开始收购较小的机构,与其他机构合并,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转变为大型商业集团。在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11 个机构拥有约 40%的入学人数,其中一个有近一半的入学人数。在这些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集团中,

只有四个尚未发行股票,另外三个是北美企业。其余四个主要的高等教育集团——包括两个最大的集团,它们是巴西的开放式资本企业,以国际投资基金为主要股东,构成巴西证券交易所(BM&FBovespa)最赚钱的部分之一。实际上,这两个集团在 2016 年试图合并,但经济防务管理委员会(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for Economic Defense)阻止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所观察到的是私营教育部门的寡头垄断,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存在风险的影响。

纵观高等教育机构领域的市场利基,最大的投资是低成本项目,不需要实验室或高薪聘请的教授,如商业和法律课程。这些课程吸收了占该国总入学人数 38% 的学生,而就读私营部门的学生占该国总入学人数的 86.8%。大多数这些课程是在晚上提供的,且作为目标群体的相当一部分人口超过了预期的学龄(非传统学生)。此外,就本科在线学习课程而言,私营部门的“霸权”非常显著,约占入学人数的 91%。同样,招生最多的专业是社会科学、商业和法律领域(44%),其次是教育(38%)领域。

在观察研究生课程时,由于实验室、图书馆和学者工资的成本,情况完全逆转了。在这一层次,就读于私营部门的学生比例仅达到入学人数的 19%。事实上,巴西的毕业

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的，使该国成为拉丁美洲和全球背景下的焦点，该国在科学生产方面列第 14 位。

对招生质量的影响

虽然私营部门学生占有所有入学人数的 76%，但私立院校的学者比例仅占教学人员总数的 57%，这表明劳动力条件可能不稳定。此外，在公共部门，56.5%的学术人员拥有博士学位，29.6%拥有硕士学位，而在私营部门，这一百分比分别为 20.7%和 48.1%。在招聘政策方面，据估计，在公共部门，84%的学者是全职聘用的；而在私营部门，这一比例为 37%。因此，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评估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评估等级从 1 到 5 级不等，第 3 级是可接受的最低等级，而在公立机构中，32.8%的院校处于最低等级——4 级，私立机构中这一比例仅为 15.5%。如果仅考虑大学的话，在公立和私立院校中处于第 4 级的院校分别占比 59%和 20%。

除了已经提出的要素，特别是某些课程的高入学率，这些指标表明，获得文凭本身往往成为学生入学的目的。也就是说，无论教育质量如何，学生似乎都可以寻求任何文凭课程，因为他们选择课程通常取决于是否容易获得文凭或是缺乏其他选择而做出这一决定。此外，他们还表明，私营部门入学人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入学机会的民主化，因为可用的选择受到很大限制。

影响

尽管巴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刚刚开

始，但由于净入学率仅为 18%，2014 年巴西批准了新的国家教育计划（National Education Plan）。该计划确定了诸如应用于教育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等目标——10 年内应达到 10%——毛入学率在同一时期应达到 33%，公共部门新生招生率为 40%。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但考虑到 2013~2014 年联邦公共部门发生的重要扩张和资本化进程，这一策略是可行的。这些过程使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入学人数翻了一番，巴西创建了 173 个新校区和 15 所新大学。这一过程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因为通过“配额法”，联邦大学在 2016 年达到了为公立学校毕业生保留 50%入学率的预期目标。尽管在巴西，有着公立学校背景的学生表明其来自低收入家庭，但法律还规定，一半的入学名额必须预留给来自人均收入低于 1.5 倍最低工资的家庭的学生。此外，法律还规定，黑人、棕色和土著人以及残疾人应被纳入配额中，其比例至少应与大学所在州相当。

不幸的是，巴西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可能会阻止公立高等教育部门扩大这一进程。实际上，正如最近的经济措施所表明的那样，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例如冻结联邦政府 20 年的费用。此外，官方话语和媒体再次声称公立大学花销巨大，因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无法承担。公共资源不被视为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投资——能够为不同地区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因为前景可能是停滞或是低质量大众化教育的继续，这不会为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任何好处。

学生流动与就业能力：埃塞俄比亚经验

Wondwosen Tamrat、Damtew Teferra

Wondwosen Tamrat: 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 (St. Mary's University) 副教授、创始校长

电子邮箱: preswond@smuc.edu.et 和 wondwosentamrat@gmail.com

Damtew Teferra: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高等教育教授、高等教育和培训发展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领导者、非洲国际高等教育网络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teferra@ukzn.ac.za 和 teferra@bc.edu

由于院校、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疯狂地应对青年膨胀、“大规模”入学和毕业生失业的不祥现实,各种言论目前都充满了对学生就业能力的担忧。毕业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他们的学术准备产生了影响,这些情况无处不在。

对于那些有能力或有机会这样做的人来说,在另一国学习被认为是提高个人就业能力的机制。这已成为学生流动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除了对学术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外,国际学习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各种优势,包括语言提升、个人发展、文化体验、全球意识和市场技能。

虽然学生流动性作为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受到了很多关注,但关于国际化与就业能力的研究,特别是国际学生的想法与期望方面的研究仍未有定论。在非洲背景下尤其如此。本文报告了一项针对埃塞俄比亚国际学生的大型研究的结果,以评估其就培训对就业能力影响的看法。

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尽管缺乏关于这一主题的可靠统计数据,但我们相信数千名埃塞俄比亚学生正在国外学习。通过政府奖学金获得的流动机会,

或者在家庭或个人的帮助下安排的流动似乎正在增加。然而,关于流动模式、目的和可能的计划的信息很少。

除展示其教育情况外,该研究旨在通过探索出国留学动机、就业能力属性和他们的能力/优势以及学生毕业后的计划等因素,探讨埃塞俄比亚学生对出国留学与就业能力间关系的看法。

研究参与者的情况及主要观点

在参与研究的 124 名国际学生中,超过 50% 的人填写了在线问卷;6 名参与者自愿参加在线访谈。大多数学生 (80%) 的年龄在 18 至 29 岁之间。只有 11% 的人年龄超过 30 岁,59% 的人是女性。在教育背景方面,88% 的人在埃塞俄比亚完成了中学教育,其余 8% 的人在非洲其他地方上过高中;4% 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学习。57% 的学生上过私立高中;21.5% 的学生曾就读于国际社区学校;16.9% 的学生毕业于公立和宗教学校。

在本研究期间,这些学生就读于四大洲的 39 所高等教育机构:北美 (50.8%),亚洲 (21.5%),欧洲 (18.5%) 和非洲其他地区 (9.2%)。学生选择各自所在大学的主要策略包括他们自己的了解、院校排名来源,

其次是大学网站和招生简介。家庭、教育代理人和朋友的影响似乎有限，这表明学生在选择其留学目的地的过程中非常积极。

尽管学生就读的院校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常春藤联盟大学（Ivy League universities），只有一小部分是自费的：72.3%的人获得全额奖学金，而 10.8%的人获得部分奖学金；6.2%的人的学费是家庭支持的。不到 2%的学生自己支付学费。

就业是出国留学的最重要动机，因此，培训与未来结果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很大。学生们相信，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可以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让他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技能和机会，正如他们选择大学和学习课程所证明的那样。在确定被认为对就业能力至关重要的属性和技能时，学生强调了对自己和他人的想法提出质疑的意愿，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能力，用外语写作和说话的能力，快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及执行能力的的能力，以及抗压能力。学生似乎对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准备程度充满信心——特别是他们有效利用时间的能力，及其与他人高效工作并精通其学习领域能力。受访者表现出信心不足的唯一领域是知识/对文化和社会差异的理解以及用外语写作和沟通的能力。学生们还强调了在国外大学学习的独特特征，这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优势。其中包括较低的师生比、尽职的教师、问责制度、对技能培训的关注以及持续评估，这些在埃塞俄比亚表面上是缺乏的。

在毕业后的计划方面，这项研究表明学生对回国的积极性很高。鉴于有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学生回归率低、人才流失严重，这一观察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同样，学生们在毕业后也对国家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尽管由于普遍缺乏对国内技能需求的认识而受到抑制。这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学生、政府和潜在雇主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

结语

通过探索如出国留学动机等因素以及分析学生所理解的就业能力中关键技能与属性，本研究证明了国际化与就业能力之间的联系。埃塞俄比亚国际学生对于出国留学优势（这对于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的认识是明确的，并通过选择的留学大学和学习课程得到证明，这些大学和学习课程有望在学生毕业时提供竞争优势。获得的品质和技能类型以及学习体验的质量被确定为选择外国院校的关键特征。这可能会对地方院校在如何设计课程及讲课技巧上产生一些影响。

此外，缺乏关于埃塞俄比亚海外学生的知识和信息证明，我们需要系统的文件和分析来支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人力资本规划和部署。这些努力将为努力吸引在海外的埃塞俄比亚的知识分子回国提供机会。这也可以深入了解国际化和出国留学的各个方面。

加纳的质量保证：收获与挑战

Patrick Swanzy、Patricio V. Langa、Francis Ansah

Patrick Swanzy: 卡内基博士后研究员

Patricio V. Langa: 南非西开普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 邮政学院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Post School Studies) 社会学家和副教授

电子邮箱: 3748273@myuwc.ac.za 和 planga@uwc.ac.za

Francis Ansah: 加纳海岸角大学 (University of Cape Coast) 教育规划与管理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研究员

电子邮箱: boansah@gmail.com

优质高等教育是非洲加速发展和帮助其在知识型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最佳机会。尽管优质教育与质量保证间的直接联系仍有争议,但这种考量加剧了人们对非洲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效质量保证机制需求的担忧。

非洲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越来越多地将使用质量保证作为一种重要机制,使高等教育与发展需求更加相关。例如,非洲联盟 (the African Union) 提出了一些倡议,以提升非洲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卓越水平,如非洲大学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非洲高等教育协调战略 (the African HE Harmonization Strategy)、调整非洲试点项目 (the Tuning Africa Pilot Project) 和非洲质量评级机制 (the African Quality Rating Mechanism)。在最近的一项倡议中,即“2014~2017 非欧联盟战略路线图” (the Joint Africa - 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Roadmap 2014~2017),质量保证是加强非洲高等教育的主要行动方针。此外,每年举办一次的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y Assurance) 是激发思想和提出优质教育战略的平台。

到 2015 年,约有 25 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国家质量保证机构来监督其高等教育系统,其他十几个国家处于相对较发达的阶段。与其他国家一样,质量保证一直是加纳振兴高等教育的核心。自该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步时期以来,它就采取了各种战略来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

历史联结

在加纳,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保证可追溯到殖民时代,当时它采取了指导的形式。当黄金海岸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old Coast) (现为加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Ghana]) 成立于 1948 年时,它隶属于伦敦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并由其进行指导,因此被迫遵守伦敦大学的学术标准。1957 年,加纳获得独立时,这种关系就结束了。加纳大学获得了主权地位,其内部机制确保了殖民指导院校遗留下来的学术标准的维持。

在加纳独立后的高等教育系统下,隶属关系继续作为质量保证措施。恩克鲁玛科技大学 (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和海岸角大学分别于 1961

年和 1962 年成立，它们加入了加纳大学的指导，直到获得特许地位。这些院校加入了加纳大学，作为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指导者，它们通过了既定的学术标准。直到 1993 年，当国家质量保证机构成立时，加纳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质量保证方面没有外部维度。

收获与挑战

20 世纪 90 年代初，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引发了人们对质量的担忧。加纳颁布立法以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使得 1993 年第 454 号法案建立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Tertiary Education）作为牵头监管机构，就整体提供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向政府提出建议。此外，1993 年临时国防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第 317 号法律设立了质量保证机构和国家认证委员会（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Board），负责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此法已被 2007 年国家认证委员会法第 744 号法案取代。

为了加强对差异化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质量保证，加纳此后又颁布了新的法案。1993 年，第 492 号法案设立了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ian Examination），其任务是监督理工学院的学术运作并规范专业和技术人员考试的进行。第 778 号法案设立了国家教学委员会（the National Teaching Council），其任务是规范和提高该国教师教育的质量。这些外部质量保证干预措施似乎为利益相关者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期望提供了良

好的保证，因为，针对 2012 年西非英语国家质量保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加纳拥有非洲最具活力的外部质量保证体系之一。

加纳在制定外部质量保证机制以加强优质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并非没有明显的挑战。首先，质量保证监管机构在技术人员和质量保证专业人员方面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定期进行监测。目前，机构审计仅每五年进行一次，且不是在所有机构中进行。其次，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但却没有相应地加强监管机构的技术和专业人员能力，这影响了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最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质量保证机构之间存在角色重复。例如，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委员会认可的高等教育课程仍需要提交给质量保证机构和国家认证委员会进行另一项认证。

结语

在加纳，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已从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殖民结构演变为建立外部质量保证机构，以便国家能满足人们对于当代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到目前为止，加纳似乎已在具有差异化机构的质量保证的外部维度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这种差异化的外部质量保证战略或许可以作为其他致力于加强质量保证体系的非洲国家的有用参考点。尽管如此，随着教育行业的快速发展，质量保证机构由于其能力有限而面临着显著的挑战。外部质量保证的成就是否对加纳提供优质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点还有待考证。

中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学术漂移

魏静、Anthony Welch

魏静：中国天津大学（Tianjin University）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weijing522@126.com

Anthony Welch：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anthony.welch@sydney.edu.au

将中国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任务并非是件新鲜事，这是通过科技（也包括科技人才）使中国变得强大的长期战略的结果，称之为“科教兴国战略”。通过这些政策，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新的使命和意义。这尤其适用于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即应用技术大学（Universities of Applied Technology），这些大学将通过提升与工业界的合作，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其他国家正努力减轻技术大学的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但中国提议将 600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转变为应用技术大学，旨在实现一项独特的使命，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与研究型大学不同，应用技术大学通过与当地中小企业合作专注于创新项目，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通过这种实践取向，应用技术大学应培养应用创新型高水平人才，并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实现整体多样化。然而，实现这些目标远比计划困难。对四所应用技术大学以及不同规模和处于不同地区的应用技术大学政策和与实践的详细案例研究表明，实现与当地工业界的合作以促进创新的目标受到强大的学术漂移的削弱，而这扭曲了原初的意图。

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重要性

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是科研和创新的重要引擎。李克强总理强有力地强调了国

家创新体系与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活动之间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中国转变为创新型国家。各领域的创新型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都给予了优惠政策。但中国高度分层的高等教育体系决定了具有更强创新记录的院校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其他资源。科研生产力也是大学排名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学术体系中，这为中国的顶尖大学提供了优势，这些大学吸引了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其毕业生更受雇主的追捧。虽然创新是国家和地区的优先事项，但在实践中，尽管应用技术大学有着通过行业协作促进区域创新的独特使命，但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处在同一种竞争中。

在中国建立应用技术大学的理由

1999 年以来建立的 600 多所本科院校（大多是地方二级大学和独立学院）被提议作为计划中的应用技术大学转型的主体。在全中国 2 600 多所可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中，这些本科院校占比很大。如上所述，应用技术大学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的重要举措。特别重要的是，它们负责提供先进的应用和技术人才，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行业需求。它们还有望帮助减轻一些主要工业部门的严重结构性失业，并加强大学内部的二元划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划分越来越

模糊。与进行基础和前沿研究的主要研究型大学相比，应用技术大学应通过直接发现新知识，而非通过将现有知识应用于实践，并通过与工业界合作改进现有流程来促进创新，这一创新过程也旨在加强应用技术大学高级技术人员的能力。然而，对应用技术大学的详细研究揭示了严重的学术漂移，这使其偏离了原来的以行业为导向和以市场为基础的使命。

应用大学中的学术漂移

学术漂移是指新兴专科院校以模仿大型研究型大学的方式推动其科研活动的趋势。作为院校同构的一种形式，这一过程往往意味着，直接有用的应用知识逐渐失去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几项对应用技术大学的详细研究揭示了这种学术漂移。虽然最初的应用技术大学计划是通过与当地企业和工业界的合作来展示创新，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发表论文和申请国家级重大科学项目——这些成就为晋升铺平了道路。学术漂移源于与绩效措施相关的院校过程，例如通过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研究型大学合作，刺激论文发表和参与主要的国家科研项目；为在高

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提供极高的经济回报；或是在国家层面上获得项目——同时为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项目提供更少的激励。再加上应用技术大学与工业界合作的竞争力较弱（在需要建议或技术援助时，工业界更愿意与现有的研究型大学联系），这些适得其反的过程会导致应用技术大学教师将其努力从主要任务中转移出去。尽管如此，在接受采访时，超过 90%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发表的论文几乎没什么用处，并承认他们撰写的大部分论文都源于复制和结借鉴他人已发表论文中的想法。

结语

应用技术大学学术漂移的过程突出了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基本矛盾。它们未使用应用技术专业知识与工业界积极合作，而是显示出强大的组织惯性，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存在的宏观政治取向优先考虑学术研究。由政府或非政府实体开发的院校排名极其重视科学和技术创新。传统评估系统的持续性也奖励论文发表和项目获得。除非政策制定者承认并成功控制这些趋势，否则学术漂移将使应用技术大学无法实现其最初使命。

俄罗斯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自治与问责制

Andrei Volkov、Dara Melnyk

Andrei Volkov: 俄罗斯莫斯科 SKOLKOVO 管理学院 (at the Moscow School of Management SKOLKOVO) 学术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andrei_volkov@skolkovo.ru

Dara Melnyk: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生助理

电子邮箱: melnykd@bc.edu

我们目前正经历大学转型的鼎盛时期, 因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寻求将其大学的角色从国家扩展到全球。在此过程中, 大学领导层的独立战略思考至关重要, 而这只有当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时才能实现。

历史视角

在整个俄罗斯高等教育 300 年的历史中, 大学自治水平一直在上升。这一理念最初是从德国借用过来, 在德国, 首次在大学章程中出现了自治, 这与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公立院校形成鲜明对比。到了十八世纪中叶, 大学已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 为了遏制这种趋势, 尼古拉斯一世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权利。后来, 在十九世纪初, 亚历山大二世恢复了其最初的、相对较高的独立水平, 作为该国欧洲化进程的一部分。

在 20 世纪 20 年代, 苏维埃政府重新划分了所有社会结构, 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大学被剥夺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所有权力, 政府统一管理大学的课程、资金、学位授予、录取、治理和教师任命。那时, 大学自治本来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独立的战略思想难以想象。冷战和军备竞赛迫使苏维埃政府

寻找新的方法来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苏联建立了一批在治理和课程设计方面具有特殊权利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的两个代表性大学是著名的莫斯科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Moscow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和国家核研究大学 (National Research Nuclear University)。

苏联解体后的时期可被称为“被遗弃的 90 年代”: 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机构给予了突然的自治权。接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的比例从 17% 飙升至 60%; 由于任何提供高等教育课程的机构都自称为“大学”, 因此“准大学”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 机构的人才流失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机构处于混乱状态, 拥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和很少的问责制。

在 21 世纪初, 大学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为了换取其发展承诺, 大学获得了大量资源和新的地位。精英大学团体 (包括著名的“5-100 学术卓越计划” [5 - 100 Academic Excellence Initiative]) 接连成立。这些机构被强行拉出“组织性冷漠” (organizational apathy), 其中一些机构利用这种势头重新展开自我构建。(与此同时, 联邦标准变得越来越松懈。) 这些举措基本上是为发展提供了条

件。然而，自我发展需要真正的自主权以及足够的战略主动性来利用这些自主权。

当今时代大学自治的代价

自治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随心所欲。代价是他们对其决定负责，对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即学生，校友，教师和公众。如果一所大学对其目标和行动负责，其学者自行决定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学生自行设计学习课程。批评“系统”变得困难。

俄罗斯长期以来缺乏自治导致了其战略思维方面的长期缺陷，以及无意义的、形式化的院校使命。这降低了大学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如果一所大学没有认真对待自己，那公众凭什么要认真对待它呢？另一方面，完全不受管制的高等教育系统注定变得混乱，而深思熟虑的监管政策可以极大地促进该系统的发展。例如，旨在推动俄罗斯顶尖大学走向全球竞争力的“5-100 学术卓越计划”已被证明是高等教育创新的有力催化剂。

90年代，他们的潮流是“准大学”，这使俄罗斯担心如果大学的自主权突然增加，院校将变得完全不负责任，教育质量将直线下降。标准观点认为，自主权和问责制是一个范围的两端，它们是相互对立的，容易导致失败：高度自治和零问责导致对公众信任的滥用；低自治和高度问责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和科研活动的复制和贫瘠。

自治与问责

然而，标准观点并非是考虑自治与问责辩证法的唯一可能方式。大学可以同时拥有

高水平的自主权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如何才能俄罗斯高等教育中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我们应鼓励顶尖大学行使设计和修改课程的权利，选择教学语言，并确定学费和录取程序。

其次，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有必要转向长期的、有竞争力的、基于绩效的整笔拨款。目前，俄罗斯政府的资金通过项目预算进行分配，这意味着分配给大学的资金将配备有严格的使用标准。该系统禁止战略投资和规划雄心勃勃的项目。

第三，大学必须努力实现收入多元化。目前，俄罗斯顶尖大学正在享受更多政府资金。虽然这对推动俄罗斯高等教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至关重要，但依赖单一资金来源限制了大学的自主权和推动自身发展的能力。

第四，战略规划中的智力倡议以及关于大学战略的最终决定权不应属于中央机构，而应该是分散的。错误是人为的，而中央机构制造战略错误的的可能性非常高，这种错误会对系统中的每所大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本土实验促进创新，在本土出现的错误不会影响整个行业。对于俄罗斯来说，方法可能是增强当地的董事会——由非专业成员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代表组成。这将再次建立大学治理与公众、学生、校友和教师之间的联系。目前，俄罗斯大学的董事会仅作为审计委员会，大部分“董事会时间”都在批准金融和法律交易。相反，他们的主要职能应是确保其大学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为了使这成为可能，俄罗斯大学必须给予董事会选举、任命和解雇该院校的管理者的权力。

越南高等教育机构的竞争性战略

Do Minh Ngoc

越南河内大学 (Hanoi University) 管理与旅游学院 (the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Tourism)

讲师

电子邮箱: ngocdm@hanu.edu.vn

为不断改革教育体系, 越南政府在 2006~2020 年期间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改革议程》(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genda), 赋予大学和学院机构自主权, 使其能够决定自己的规模和财务状况。虽然议程即将结束, 高等教育机构已于 2014~2017 年完成了一项试验项目, 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议程的一部分, 但现在是时候越南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反思战略, 为前进的必要变革做准备, 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和存在。

改革议程

自 1986 年改革 (Doi Moi) 政策以来, 越南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突破性的变革, 包括取消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控制, 以及对于开办私立大学和学院的许可。但是, 学术机构仍需进行集中规划, 并在经济上依赖政府资金。为提高其高等教育机构在市场驱动型经济中的质量和相关性, 越南政府认识到转型是不可避免的, 于 2005 年批准了《高等教育改革议程》(称为第 14/2005/NQ-CP 号决议)。《高等教育改革议程》中一个关键的要素是允许大学自行决定招生名额和课程内容, 并管理自己的预算活动。总的来说, 《高等教育改革议程》已被公众和大学广泛接受, 并有望彻底改革高等教育体系。到目前为止, 得益于《高等教育改革议程》, 该国所有院校都获得了独立管理权, 科研和教学人员的素质也得到了提高。

虽然政府仍然为其业务提供部分资金, 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仍是最终目标, 正如副总理在最近一次审查 2014~2017 年试点项目的会议上所证实的那样。最终, 院校与独立企业不会有任何不同, 因此, 本文采用战略管理视角来分析其共同战略。一般来说, 大学主要服务于国内学生, 他们在企业和商业层面的战略旨在促进发展和扩张。

企业层面的战略

许多机构通过与外国同行开展联合学术课程, 在公司层面实施合作战略。这是 1987 年政府利用国际合作以使教育系统财政资源多样化的政策的结果。此类联盟最初是在 1998 年设立的, 国际联合课程的数量从那时起一直在增加。联合课程的选择范围从文凭到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再到博士学位。参加这些课程的学生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以获得外国课程, 获得国外大学的学位, 并且可以选择在越南完成一半的课程, 在国外完成另一半课程。国际联合课程为院校创造了可观的收入, 有助于提升学术质量、提高声誉, 并通过改进课程的方式吸引更多学生。

商业层面的战略

市场渗透方法旨在增加当前市场上现有服务的销售额, 这意味着招收更多学生参加现有课程。多年来, 越南院校增加了招生名额。从 1999~2013 年, 政府政策刺激了高等

教育总入学人数的增加，目的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尽管如此，技术和市场需求之间的一致性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解决。

市场开发涉及向新市场引入现有服务，这意味着将现有课程的提供扩展到新的学生群体。越南学术机构为国内学生开设了英语课程，并允许外国学生参加这些课程，与国内学生一起学习。吸引国际学生一直是明确的政府政策，其举措包括在 2008 年采用昂贵的计划提供英语本科课程，并将高知名度的教授带到越南，或是最近允许大学自行决定其招收外国学生的标准。然而，英语课程缺乏多样性和课程质量相对较低是招收国际学生和学者的主要障碍。

产品开发需要为当前市场提供新服务，这意味着为国内学生开发新课程。这是越南院校最突出的战略举措。越南的高等教育机构不是单学科就是多学科的。据报道，多学科大学的数量也在增加。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新课程的数量和选择越来越多。这最明显地反映了越南院校作为教学机构依靠学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本质。

产品多样化意味着通过新服务进入新的细分市场。在这里，该方法涉及进入新的学习者群体。许多大学为成人提供培训（语言、

计算机、实用技能等）。与此同时，一些机构实施多样化策略以达到教育的早期阶段或不同阶段。河内国立教育大学（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由资优学生高中（the High School for Gifted Students）、阮必成学校（Nguyen Tat Thanh School，包括初中与高中）以及一所幼儿园组成。华森大学（Hoa Sen University）最近建立了外语和海外研究中心，该中心为成人和年轻学习者（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提供服务，提供英语课程和海外学习咨询。

在挣扎中完善自我

到目前为止，越南学术企业的战略主要是以政府计划为导向，其行动主要是做出回应而非主动出击。长期以来，作为集中系统的一部分，大学和学院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并符合国际标准。如果允许完全自治，越南高等教育机构的表现可能比从鸟巢（国家以前提供所有解决方案的避风港）掉下来的幼鸟还要惨——有些人可能会摔倒，有些人会学习然后得以提升。在此之前，政府应继续解决该制度的缺点，以更好地促进越南高等教育的独立性。

